

權力與符號的流轉： 明代中期藩王府五爪龍紋瓷器^{*}

尹翠琪^{**}

提 要

在明代（1368-1644），五爪龍紋是皇帝的象徵，禁止官民使用。然而，對於既非皇帝亦非官民的明代藩王，五爪龍紋又象徵什麼？十五世紀中期出現一類繪有五爪龍紋及十字菱格紋的青花瓷器，它們在中國多地的藩王及親屬墓、王府及民窯遺址皆有發現，性質屬官方或民間製品一直未有定論。本文旨在探討這類瓷器的屬性及其產生原因。通過比較明初至中期的官窯瓷器、帝王畫像、明都城及藩王墓等遺址發現的不同龍紋形態，本文提出這類藩王府龍紋瓷器的生產，很可能是在皇帝默許下，由藩王府或經由地方官員向特定的景德鎮民窯訂燒或購買。瓷器採用官樣龍紋，但迴避象徵當朝皇帝的升龍樣式，並搭配民間流行的十字菱格紋邊飾，藉以表達藩王低於皇帝、同時超然於臣民的獨特社會地位。

關鍵詞：藩王、龍紋、瓷器、明代、空白期、南薰殿、景德鎮

* 收稿日期：2023 年 4 月 13 日，通過刊登日期：2023 年 9 月 18 日

**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副教授

龍紋，早在北宋已是皇帝意欲壟斷的圖像，一再詔令禁止民間使用，不過當時文獻尚未明確定義專屬皇帝的龍紋形象。¹直至十四世紀初，蒙元王朝的統治者才清晰界定龍的外貌特徵。延祐二年（1315），元仁宗（1285-1320）定「貴賤服色等第」第一條：「蒙古人不在禁限，及見當怯薛諸色人等亦不在禁限，惟不許服龍鳳文。龍，謂五爪二角者。」²「龍」明文界定為五爪二角，禁止所有種族的官民使用，而此觀念亦為明代統治者所繼承。明代帝皇器服上的龍紋，無一例外為五爪；不許官民製造和使用龍紋的禁令，亦貫穿整個明代。此觀念不僅深植明人的意識之中，也是現今研究中國文物學者的普遍認知。

然而，對於既非皇帝亦非官民的明代藩王，五爪龍紋象徵甚麼？在皇帝和藩王的社會地位流動並非絕不可能的明代，藩王瓷器避用皇帝主導的升龍紋而採用其他龍紋形態，展現出甚麼設計目的？藩王龍紋瓷器的生產，又與江西景德鎮民窯的發展有何關聯？

上述問題，對於出土和傳世帶有龍紋裝飾的藩王府瓷器，重要性尤其明顯。所謂「藩王府瓷器」，是指明代藩國的親王（藩王）、郡王、藩府將軍、中尉及其眷屬所使用的瓷器。³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中國各地發現的明藩王及其親屬

※ 本論文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研究資助局資助的研究計劃「明代藩王的瓷器生產與消費文化」（編號：CUHK14609018）的研究成果。研究期間承蒙成都考古研究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唐英學社、國立故宮博物院等機構大力支持，得以觀摩出土及館藏瓷器，在此表達衷心感謝。特別鳴謝肖發標、蔡路武、江建新、陸明華、黃清華、古篤學、謝明良、余佩瑾、吳曉筠、陳玉秀、黃蘭茵、王亮鈞、王冠宇、高憲平、鄭澤婷、趙惠盈諸位先生在過程中提供協助；感謝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的訪學邀請，讓筆者能在臺北專心完成論文初稿；盧慧紋、施靜菲、林聖智諸教授的講座邀請，讓本文初稿可在國立臺灣大學和中央研究院發表並收集意見。特別感謝兩位匿名評審為本文提供修訂建議。文中錯漏之處，一概為筆者責任。

1 有關龍紋在宋代的發展，見宮崎市定，〈關於二角五爪龍〉，收入宮崎市定著，張學鋒、尤東進、馬雲超、童嶺、楊洪俊、張紫毫譯，《中國的歷史思想——宮崎市定論中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頁169-182。原文載於1965年出版的《石田博士頌壽紀念東洋史論叢》；Patricia Ebrey, "Huizong and the Imperial Dragon: Exploring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Imperial Sovereignty,"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41.1 (2011): 39-71；謝明良，〈龍與龍珠〉，收入《陶瓷手記5：中國陶瓷的器形、紋飾與圖像》（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3），頁108-116。筆者感謝匿名評審提供上述參考資料。

2 陳高華、張帆、劉曉、黨寶海點校，《元典章》（北京：中華書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據1972年臺灣故宮博物院影印元刻本），冊2，卷29，〈禮部二·貴賤服色等第〉，頁1028；（明）宋濂等撰，《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據洪武九十九卷本和南監本），卷78，〈輿服一·服色等第〉，頁1942；卷105，〈刑法四·禁令〉，頁2680。

3 洪武二年（1369），明太祖確立封建諸王國的制度，皇帝嫡長子立為皇太子儲君，其餘眾子封為親王，分封到全國各地建立藩國。親王除了嗣王位的嫡長子外，其餘諸子封為郡王；郡王嫡長子封郡王世子，其餘眾子封鎮國將軍。郡王之孫封輔國將軍，曾孫封奉國將軍，四世孫封鎮

墓葬不下 40 個，各墓出土瓷器數量不等，有的多至 18 件，有的沒有瓷器隨葬。⁴ 近年，蜀王府、淮王府等藩王府宮殿遺址的考古發掘，出土大量藩府日用瓷。⁵ 再加上各地公私收藏藩府銘款瓷器的陸續發現，累積至今，出土和傳世藩王府瓷器的數量已十分可觀，而且當中有不少以五爪龍紋為飾。事實上，學界早已認識到藩府瓷器上有五爪龍紋（圖 1），不過一直沒有注意到供御瓷器與藩府瓷器的五爪龍紋的關係，且幾乎完全忽略五爪龍紋的形態特點。

早期學界對藩王府龍紋瓷器的興趣，主要落在魯荒王朱檀（1370-1390）、鄧靖王朱棟（1388-1414）等明初藩王及功臣墓出土的「至正型」青花瓷。由於這些青花瓷多繪畫側面行龍紋，因此研究焦點在於比較元代和明初墓葬出土瓷器上龍紋的背鰭、眼球、顎鬚等細節，目的在判定瓷器的生產年代屬元代抑或明初，因此未有深入討論藩王府龍紋瓷器。⁶

2006 年丁鵬勃出版〈明代藩王墓出土瓷器研究〉，是最早針對藩王府用瓷的綜合性研究，分析 27 處藩王墓出土瓷器的類型、年代、產地及來源。文章雖沒有針對龍紋討論，但已指出藩王用瓷包括民窯器和御窯器兩種：前者由王府或墓主生前購置；後者來自朝廷賞賜，及至明晚期還有作為商品出售的供御窯瓷器。⁷ 從丁文所見，藩王墓出土的瓷器樣式極少重複，論及的五爪龍紋瓷器似乎都屬朝廷賞賜，或晚明時期由王府購置。

國中尉，五世孫封輔國中尉，六世孫以下皆封奉國中尉。（清）張廷玉等撰，《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據清武英殿本），卷 2，〈本紀二·太祖二〉，頁 22；卷 116，〈列傳四·諸王〉，頁 3557。

- 4 丁鵬勃，〈明代藩王墓出土瓷器研究〉，《中國歷史文物》，2008 年 1 期，頁 48-51。劉毅新近的研究羅列了已發現的明藩王、郡王墓葬。他據文獻統計明代親王等級陵墓，理論上在兩京以外應有近 280 座，但現有詳盡考古報告的大概只有約十分之一。劉毅，《明代藩王陵墓考古學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21），頁 4-7、32-36、99-102。
- 5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編著，《明代淮王府遺址出土瓷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20）；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成都東華門明蜀王府宮城苑園建築群發掘簡報〉，《文物》，2020 年 3 期，頁 11-38；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景德鎮陶瓷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著，《成都東華門明代蜀王府遺址出土瓷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22）。
- 6 亀井明德，《元代青花白瓷研究》（川崎市：亞洲古陶瓷學會，2009），頁 9；矢部良明，〈宋元の龍文様と元磁〉，《Museum》，242 號（1971），頁 13-23；矢部良明，〈景德鎮民窯の展開〉，收入相賀徹夫編，《世界陶磁全集·14·明》（東京：小學館，1976），頁 226-261。有關明初藩王及功臣墓出土「至正型」青花瓷的研究回顧及新見，見張璋恬，〈明代藩王功臣墓出土至正樣式青花器的年代問題〉，《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42 期（2017），頁 91-156。
- 7 丁鵬勃，〈明代藩王墓出土瓷器研究〉，頁 55、62。此後，對藩王墓出土瓷器的斷代研究，見張睿洋，〈明代藩王墓出土瓷器斷代分期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論文，2016。

過去十年，隨著「空白期」（正統至天順朝，1436-1464）瓷器成為中國陶瓷史學界的研究熱點，藩府龍紋瓷器逐漸受到關注。2012年，深圳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作舉辦「填空補白：景德鎮明代十五世紀中期瓷器」專題展覽，在深圳文物考古研究所展出百多件瓷器和瓷片，其中包括景德鎮戴家弄澡堂工地發現的一批帶龍紋和鳳紋的瓷器。戴家弄不在明代御窯廠範圍，出土瓷器上的龍紋有五爪和四爪，紋飾設計相當一致。黃清華將它們按胎釉、青料、繪畫質量分成精細型和粗放型兩類，器類有碗、盤、高足杯等，盤和高足杯皆有多種規格，他認為這批瓷器的生產組織者是官方，而非民間窯業主。⁸雖然這批瓷器並非來自考古發掘，但由於明藩王墓和藩王府有出土同類瓷器，因此它們被認為是專為藩王府燒造。⁹這項發現的重要性，在於它似乎暗示明代可能存在一套藩王府日用瓷器的供應制度，而瓷器的基本紋飾是龍紋。

2013至2015年期間，柯律格（Craig Clunas）出版著作《藩屏：明代中國的皇家藝術與權力》（*Screen of Kings: Royal Art and Power in Ming China*），而大英博物館亦舉辦「明：皇朝盛世五十年」（*Ming: 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展覽，掀起英美學界對明代藩王及其藝術文化的興趣，可惜藩府瓷器並未受到關注。¹⁰

2014年景德鎮御窯廠龍珠閣北麓考古發掘，出土大量被定為「空白期」的官窯瓷器，整理後於2018年至2019年間舉行了三次大型展覽及研討會。¹¹其中，2019年於上海博物館舉行的展覽，在「亦官亦民——分封藩王遺留物」部份首次

8 黃清華的介紹內容，參見秦大樹、高憲平，〈景德鎮明代「空白期」窯業遺存的考古學探索與新認知〉，《中國陶瓷》，56卷9期（2020），頁73。據黃清華於2021年「王者之器——明代藩王用瓷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演講，景德鎮戴家弄澡堂工地除出土青花瓷片外，也有龍紋彩瓷瓷片，包括低溫綠釉青花瓷片、孔雀藍彩暗刻龍紋瓷片、霽藍釉瓷和藍地留白瓷片等品種，特殊器類包括欄板和盞盤。

9 戴家弄出土的瓷器，於2018年8月在唐英學社舉行的「藩府佳器——明代正統景泰天順三朝景德鎮窯業特展」中亦有展出。

10 《藩屏：明代中國的皇家藝術與權力》開創性地結合歷史記載和明藩王遺留的書籍收藏、藝術作品、考古材料等實物，重新審視長久被忽略的明藩王在明代社會和文化的位置。在大英博物館舉行的「明：皇朝盛世五十年」，亦包括幾個明藩王墓的出土文物。Craig Clunas, *Screen of Kings: Royal Art and Power in Ming China*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3)；柯律格（Craig Clunas），黃曉鵬譯，《藩屏：明代中國的皇家藝術與權力》（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Craig Clunas and Jessica Harrison-Hall, *Ming: 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4)。

11 2018年5月，北京故宮博物院、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聯合主辦「明正統、景泰、天順御窯瓷器展」；8月，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聯合主辦「填空補白 II：考古新發現正統、景泰、天順御窯瓷器展」；2019年5月，上海博物館、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聯合主辦「灼爍重現：15世紀中期景德鎮瓷器展」。

將湖北江夏、武昌和山東兗州藩王墓出土的龍紋瓷器一併展出。¹² 參與策劃展覽的陸明華認為，戴家弄發現的瓷器雖然質量上明顯低於官窯瓷器，但具備明顯官瓷元素，即龍鳳紋和官器樣式，應屬於官瓷或官樣瓷。它們跟湖北、山東和四川藩王墓和王府遺址出土的正統至天順龍紋瓷器相類，可能是指定提供藩王使用的訂燒瓷。¹³

針對上述湖北、山東、四川及景德鎮戴家弄出土的龍紋瓷器，秦大樹和高憲平進一步認為，這些在「空白期」由官方組織民窯燒造的瓷器，可視為「官搭民燒」的雛形，並且提出「樣制」或「藩樣」的新概念：明初隨著藩王制度確立，官方應該訂定了一個兼具「官樣」和民窯特點的設計，用於瓷器及其他藩王用器上。¹⁴ 不過，文中除了指出「樣制」包含龍紋和民窯輔助紋樣（菱形十字錦紋和二方連續S形紋樣），未有更多說明。

2021年10月，景德鎮中國陶瓷博物館主辦「王者之器——明代藩王用瓷展」，首次匯集展出中國各地藩王墓、王府遺址、景德鎮窯址出土以及傳世的明代藩王瓷器及資料，並舉行研討會和出版圖錄，其中陸明華〈明代各地藩王用瓷再研究〉一文探討幾個藩王府的出土和傳世瓷器，深入討論藩王用瓷的類型、來源、燒造彩瓷等議題；鄭澤婷〈明代藩王瓷器銘款匯考〉一文詳細研究21個明藩王府經調查、考古發掘和傳世具銘款的瓷器。¹⁵ 這次展覽及圖錄文章，大大地推進了學界對藩王府瓷器的整體認識，亦為本文提供了重要基礎。

本文的研究對象，即上文論及一類用五爪龍紋為主紋飾，並帶十字菱格邊飾的瓷器（圖2）。迄今所見，這類五爪龍紋藩府瓷器的生產年代，集中在明中期的正統至天順朝及十六世紀上半葉，產地為江西省景德鎮。明中期主要是青花瓷，而十六世紀則包括青花、紅彩和紅綠彩瓷。器型主要有碗、碟和高足碗等。由於瓷器品種和生產背景的差異，本文會集中討論生產於十五世紀中期的青花龍紋瓷器，而十六世紀的生產情況將另文探討。

12 上海博物館編，《灼爍重現：15世紀中期景德鎮瓷器特集》（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圖213-217。

13 陸明華，〈明正統、景泰、天順景德鎮瓷器及相關問題〉，收入上海博物館編，《灼爍重現：15世紀中期景德鎮瓷器特集》，頁17-20。

14 秦大樹、高憲平，〈景德鎮明代「空白期」窯業遺存的考古學探索與新認知〉，頁73-75。

15 兩文見於葉謙、趙綱、邵紅主編，《王者之器——明代藩王用瓷特展》（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23待刊）。

本文的目的，是通過疏理實物與文獻，探討十五世紀中至下半葉藩府五爪龍紋瓷器的屬性及產生原因。基於對明代文獻的整理，本文將指出：一，明朝廷沒有為藩府置辦日用瓷器的規定；二，文獻也沒有皇帝賜四爪龍紋器物予藩王的記載；三，藩王按規制器服應用五爪龍紋；四，在明中期，藩王不會因為製造飾有五爪龍紋的器物而受到嚴懲，皇帝只會勸告。

通過比較明初至中期的官窯瓷器、帝王畫像以及明都城、藩王墓等遺址發現的龍紋器物，本文將提出，明中期藩王府的青花五爪龍紋瓷器，捨棄當朝官窯流行的龍紋形態，選用已過時或次要的官樣龍紋，並搭配民間常用邊飾，反映其生產最初可能是個別藩王府向景德鎮有能力生產高質素瓷器的少數民窯訂燒，及後在皇帝默許下，逐漸成為藩王階層認可的龍紋瓷器設計。這類瓷器既採用官樣龍紋，同時又迴避使用象徵當朝皇帝的升龍樣式，設計上表達出藩王低於皇帝、同時超然於臣民的獨特身分。明代藩王對官樣龍紋有具體認識，同時有向民窯訂燒和置辦日用瓷的實際需要。他們在地方擁有的強大財力，使他們成為明中期景德鎮民窯發展的重要助力。

本文第一節將先介紹藩王府龍紋瓷器的特點，並透過與明中期以前官窯瓷器的龍紋並置，凸顯兩者的差異。據此，第二節進一步將藩府瓷器的龍紋樣式，與明代皇帝座像、明都城、藩王墓等出土器服上的龍紋比較，考察十五世紀五爪龍紋在形態上的變化與潮流，及跟藩府瓷器上的龍紋的關係，藉以推論藩王府龍紋瓷器的性質。第三節將通過文獻疏理，特別是明代官民和藩王使用五爪龍紋的規制與案例，釐清過去對藩王使用五爪龍紋的誤解，並探討龍紋對明代統治階層的意義。第四節會將上述藩王府龍紋瓷器的分析，重置於明正統朝以來景德鎮民窯的發展脈絡，討論藩王參與明中期民窯發展的情況。

一、藩王府瓷器上的龍紋：形態與特點

本文研究的藩府龍紋瓷器，在四川成都蜀王府宮城遺址、湖北武昌、江夏和山東兗州的王室墓群，及景德鎮戴家弄澡堂工地（明代民窯生產區）皆有發現，同時亦見於私人收藏。這類瓷器的裝飾有兩個特徵：一，主紋飾是龍紋；二，邊飾多為十字菱格紋。其中，在瓷器內底繪畫的龍紋，可細分為A型（圖3a）和B型降龍紋（圖3b）、A型升龍紋（圖4a）以及新樣龍紋（圖5）四種。

（一）器內底的龍紋樣式

A 型降龍紋（圖 3a）裝飾的青花瓷器數量最多，紀年例子有湖北武漢楚藩景陵順靖王朱孟炤（1393-1447）夫婦墓出土的兩件青花盤。¹⁶ 以其中一盤為例，其內底雙圈繪畫一條降龍，龍頭處於下方，昂首，龍身呈倒 C 形而朝上彎曲成新月狀（圖 1）。一雙前腿和一雙後腿皆在龍身兩側向外伸張，左方後腿沒有與龍尾交疊。龍首前方繪火珠及雲紋，瓷器口沿內壁一道十字菱格紋，外腹壁繪前後追逐火珠的行龍兩條，器底無款。此器出土自朱孟炤的墓穴。孟炤於永樂二年（1404）封景陵郡王，薨於正統十二年（1447）。¹⁷ 此盤的生產年代不晚於正統朝末。

A 型降龍紋還見於下列出土瓷器：山東兗州魯藩鉅野王墓群被盜後所經徵集回收的四件青花龍紋碟（圖 6），¹⁸ 四川成都蜀王府宮城遺址水道出土的少量青花盤和青花碗，以及戴家弄澡堂工地發現的一批瓷碗、盤和高足碗等。¹⁹ 此外，有兩個特別例子，包括繪有 A 型降龍紋但內外皆無十字菱格邊飾的青花龍紋盤，出自湖北武昌流芳嶺楚昭王家族墓（圖 7）。²⁰ 另一青花雲龍紋高足杯出土於湖北江夏流芳嶺楚藩明妃子墓，該器內底以朵雲紋取代降龍紋，口沿內壁繪十字菱格形，外腹壁繪行龍紋（圖 8）。²¹ 上述瓷器定為「空白期」產品。

B 型降龍紋（圖 3b）與 A 型降龍紋相異之處，在於前者左方後腿橫舉與上拱的龍尾交疊，形成小圈。迄今發現至少三例：湖北武漢江夏流芳明王室墓群中，鎮國將軍朱季堦夫婦合葬墓出土一件青花雲龍紋碗，內底繪 B 型降龍紋，外口沿菱格紋一周，外腹壁繪海水龍紋，器底青花書「天順年置」（圖 9）。鎮國將軍朱季堦是楚昭王朱楨（1364-1424）的孫子，葬於成化七年（1471）。²² 在同一墓群，

16 武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漢市江夏區博物館，〈武漢江夏二妃山明景陵王朱孟炤夫婦墓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10 年 2 期，頁 46-56、彩版四；蔡路武，〈湖北明代「空白期」瓷器研究〉，《文物天地》，2016 年 11 期，頁 56。

17（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 101，〈諸王世表二〉，頁 2613-2614。

18 山東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魯荒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上冊，頁 393-394；下冊，圖版 307-310。

19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成都東華門明蜀王府宮城苑園建築群發掘簡報〉，頁 20-23、圖 27。筆者感謝易立先生安排參觀蜀王府出土瓷器。至於景德鎮戴家弄澡堂工地發現的瓷器，筆者感謝唐英學社黃清華先生安排參觀。有關器物，詳見黃清華，〈明代早期藩王用瓷初考〉，發表於 2021 年 10 月 18 日於景德鎮中國陶瓷博物館舉辦之「王者之器——明代藩王用瓷特展學術研討會」。

20 蔡路武，〈湖北明代「空白期」瓷器研究〉，頁 61，圖 7。

21 蔡路武，〈湖北明代「空白期」瓷器研究〉，頁 61，圖 5。

22 蔡路武，〈湖北明代「空白期」瓷器研究〉，頁 64-65，圖 14。

朱季堞的曾孫輔國將軍朱均鉢夫婦墓亦出土一件青花龍紋高足杯，器內底繪 B 型降龍紋，外腹壁亦繪海水龍紋（圖 10）。輔國將軍朱均鉢薨於正德四年（1509）。²³ 此外，蜀王府遺址亦出土一件瓷盤，底心用 B 型降龍紋，不過該龍各腿皆只有四趾（圖 11）。²⁴ 景德鎮戴家弄澡堂工地亦發現少量青花高足杯帶 B 型降龍紋，不過繪畫較草率，與上述墓葬出土例子差異較大（圖 12）。

除上述兩種降龍紋外，藩府瓷器上還有兩種升龍紋，即 A 型升龍紋和新樣龍紋。A 型升龍紋迄今僅一例，為景陵王朱孟炤的墓穴所出的三件青花龍紋盤之一。瓷盤內底的 A 型升龍紋，龍身呈「3」字形，頭、尾及一雙前腿皆朝左，後腿則朝右跨行（圖 2）。²⁵ 至於新樣龍紋，則見於蜀王府宮城遺址出土的青花盤，底心龍紋的前腿分別向左右伸張，龍身比一般升龍多一彎，後腿呈跨行狀（圖 13）。景德鎮戴家弄澡堂工地亦發現新樣龍紋瓷器殘片。

上述四種龍紋樣式，除 A 型升龍紋外，皆可見於蜀王府宮城遺址。從景德鎮戴家弄工地發現所見，A 型降龍紋數量最多，新樣龍紋和 B 型降龍紋也有數例，不過礙於戴家弄發現的瓷器並無考古出土的地層依據來判斷產品的年代早晚關係，因此只能確定 A 型、B 型降龍紋及新樣龍紋曾在同一地點生產。而且，A 型升龍紋與 A 型降龍紋在正統十二年（1447）之前已為藩王府所用，至於 B 型降龍紋的使用年代，則不會晚於天順朝（1457-1464）。

（二）與官窯瓷器比較

對比明初中期景德鎮御窯廠生產的官窯瓷器，藩府瓷器除了胎體潔白度、器型規整度、青花發色和畫工不及官窯，龍紋形態的差異和十字菱格紋的使用也值得注意，特別是藩府瓷器內底採用的降龍和升龍形態，與明初中期官窯選用的並不一致。

1. 降龍

降龍紋，在永樂、宣德朝開始普遍採用於官窯瓷器的內底或器身，絕大多為 B 型降龍紋（圖 3b），即龍的左方後腿橫舉與龍尾交疊形成小環，跟藩府瓷器大多

23 蔡路武，〈湖北明代「空白期」瓷器研究〉，頁 66，圖 18。

24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景德鎮陶瓷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著，《成都東華門明代蜀王府遺址出土瓷器》，頁 100。

25 武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漢市江夏區博物館，〈武漢江夏二妃山明景陵王朱孟炤夫婦墓發掘簡報〉，頁 50，圖 6：1。

數採用腿尾無交疊的 A 型降龍紋不同（圖 3a）。B 型降龍紋是明代官窯的經典樣式，可見於出土和傳世的十五世紀初青花、霽紅釉描金等瓷器，如景德鎮珠山御窯遺址出土的永樂無款青花雲龍紋執壺（圖 14）、宣德款青花團龍紋洗、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無款紅釉描金雲龍紋盤、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宣德款青花雲龍紋碗（圖 15）等。²⁶至於 A 型降龍紋，十五世紀上半葉僅見於官窯瓷器的群龍紋樣，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宣德款青花雲龍紋葵式高足碗，外腹壁的 A 型降龍紋與升龍紋構成「升降龍」組合裝飾（圖 16）。²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無款青花霽紅海水龍紋盤，外腹壁的 A 型降龍為九龍之一，與 2014 年景德鎮御窯廠遺址出土正統至天順朝的官窯瓷器相似，A 型降龍紋也是作為九龍或五龍之一繪於器外腹壁，是當時官窯甚為流行的群龍紋裝飾（圖 17-18）。²⁸

成化朝（1465-1487）基本上沿襲前朝，主要採用 B 型降龍紋為器內底裝飾。²⁹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一件青花海水白龍紋盤，內底繪 A 型降龍紋，是成化朝的罕見例子。³⁰及至弘治朝（1488-1505），B 型降龍紋仍大量用於裝飾青花、白地綠彩等瓷器。總括而言，十五世紀上半葉的官窯瓷絕大多數採用 B 型降龍紋，而藩王府瓷器流行的 A 型降龍紋，在官窯瓷器上只作為升降龍、五龍或九龍之一出現。

2. 升龍紋

升龍紋是十五世紀官窯瓷器的主要紋飾。宣德官窯瓷器上的升龍紋，樣式較多變，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宣德款青花穿蓮龍紋大碗為例，龍首在上，龍身呈「3」字形，龍首和尾皆朝左，前腿在身兩側向左右伸張，後腿則一前一後朝右跨

26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編著，《景德鎮出土明代御窯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圖 40；故宮博物院、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編，《明代宣德御窯瓷器：景德鎮御窯遺址出土與故宮博物院藏傳世瓷器對比》，圖 44、106。另見廖寶秀，《明代宣德官窯菁華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8），圖 101、111、139、183、189。

27 廖寶秀，《明代宣德官窯菁華特展圖錄》，圖 114。

28 王冠宇、江建新主編，《填空補白 II：考古新發現明正統、景泰、天順御窯瓷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19），圖 13、144；上海博物館編，《灼爍重現：15 世紀中期景德鎮瓷器特集》，圖 18、27。故宮博物院、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編，《明代正統、景泰、天順御窯瓷器：景德鎮御窯遺址出土與故宮博物院藏傳世瓷器對比》（北京：故宮出版社，2019），圖 64、68、103、104、108、110、111、112。

29 故宮博物院、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編，《明代成化御窯瓷器·上·景德鎮御窯遺址出土與故宮博物院藏傳世瓷器對比》（北京：故宮出版社，2016），圖 55。

30 蔡和璧，《成化瓷器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3），圖 16。

步（圖 19）。³¹ 此樣式的升龍紋，本文稱「B 型升龍紋」（圖 4b），自正統朝開始，成為明代官窯最為流行的升龍樣式，大量見於 2014 年景德鎮御窯廠珠山北麓出土的十五世紀中期瓷器（圖 18），並一直盛行至十六世紀。³² 與官窯相反，十五世紀中期藩府龍紋瓷器未見採用 B 型升龍紋。而藩府瓷器採用的 A 型升龍紋，亦只偶爾作為九龍之一裝飾官窯瓷器，如 2014 年景德鎮珠山北麓出土的青花海水白龍紋盤，內底繪 B 型升龍紋，A 型升龍紋則僅為外腹壁的九龍紋之一。³³ 由此可見，十五世紀官窯和藩王府瓷器在升龍紋的選用上，呈現截然不同的趨勢。

3. 新樣龍紋

蜀王府宮城遺址出土的新樣龍紋（圖 13），至今尚未在明代官窯瓷器上發現。不過，新樣龍紋的上半部，包括龍頭、前雙腿、身軀的上部都與 B 型升龍紋幾近一致，只是尾部多加一曲，尾巴延長並彎曲向上，而後腿則與龍首朝相同方向跨步。由此看來，新樣龍紋也可算是升龍紋的「變種」。

4. 十字菱格紋

藩王府瓷器的第二個特點，是大多採用十字菱格紋為邊飾。所謂「十字菱格紋」，亦稱「菱格紋」、「菱格幾何紋」、「菱格錦紋」等，表現上有多種變化，基本由兩組（每組由兩至三條平行線組成）相對的折線構成連續不斷的菱格，再在菱格中心運用線條構成或虛或實的十字形裝飾。早在元代，十字菱格紋已是青花瓷的常用邊飾。從現存實物所見，採用十字菱格紋的元青花可見於性質不同的出土和收藏地，既有在中國境內河北保定、江西高安、江蘇金壇等地的元代窖藏，也見於海外收藏（諸如土耳其托普卡宮博物館和伊朗國家博物館所藏的大件器）、海上貿易沿線遺址，以及江西景德鎮珠山北麓風景路出土疑為皇室用器的殘片等等。³⁴ 其中，伊朗國家博物館藏青花波濤龍紋盤及景德鎮珠山出土的青花雲龍紋帶

31 景德鎮御窯珠山出土有形態相同的宣德款青花碗，參見故宮博物院、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編，《明代宣德御窯瓷器：景德鎮御窯遺址出土與故宮博物院藏傳世瓷器對比》，頁 66-69，圖 24。

32 上海博物館編，《灼爍重現：15 世紀中期景德鎮瓷器特集》，圖 80、81、93、95、100-106、109-112、149-162。

33 故宮博物院、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編，《明代正統、景泰、天順御窯瓷器：景德鎮御窯遺址出土與故宮博物院藏傳世瓷器對比》，圖 106。

34 上述四類元青花的例子，皆可見於陳燮君、陳克倫主編，《幽藍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集（修訂本）》（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2），圖 6、9、24、30、33（海外收藏）；圖 56、66（元代窖藏）；圖 87（景德鎮珠山）；圖 89（海外遺址）。更多土耳其托普卡宮博物館和伊朗國家博

蓋筒罐，皆以龍紋配十字菱格紋邊飾，與本文討論的藩府瓷器特點相似。³⁵

元代生產青花瓷的窯址，遍及景德鎮珠山、湖田和鎮區多處，因此十字菱格紋應是元代以來景德鎮瓷匠熟知的邊飾。雖然元末明初景德鎮民窯的青花瓷生產停滯，但當明正統朝青花瓷全面恢復生產，十字菱格紋邊飾又再次獲普遍採用。景德鎮落馬橋窯址及各地明墓皆有出土明正統至天順朝帶此邊飾的瓷器（圖 20-21）。³⁶ 傳世正統至天順朝的例子更多。³⁷ 因此，有學者將十字菱格紋視為明景德鎮民窯常用的輔助性紋樣。³⁸

相反，十字菱格紋邊飾在明初官窯瓷器的使用十分有限，迄今所見，僅用於搭配轉枝花卉或蓮塘紋，如 1982 年景德鎮御窯珠山出土的宣德款青花高足碗。³⁹ 十六世紀之前，官窯瓷器罕有以十字菱格紋搭配升龍紋或降龍紋。藩王府瓷器採用十字菱格紋邊飾，也是偏離官窯瓷器發展，而近於當時民窯瓷器的裝飾潮流。

（三）明初建築構件上的龍紋

綜上所述，十五世紀中期藩王府瓷器上的龍紋，與官窯瓷器呈現不同的發展

物館收藏的例子，見 T. Misugi, *Chinese Porcelain Collections in the Near East Topkapi and Ardebil*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1), volume I: 152, 174-175; volume II: 69, 70, 72-75, 80; volume III: 80-84, 95-96.

35 陳燮君、陳克倫主編，《幽藍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集（修訂本）》，圖 33、87。

36 景德鎮落馬橋窯址出土例子，如青花雲紋碗、青花雲龍紋蓋罐、青花人物紋渣斗等，見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西景德鎮落馬橋紅光瓷廠窯址明清遺存發掘簡報〉，《文物》，2020 年 11 期，頁 4-36，特別是頁 13-14，圖 23、27；秦大樹、高憲平，〈景德鎮明代「空白期」窯業遺存的考古學探索與新認知〉，頁 63-77，特別是頁 73-75；秦大樹、高憲平、翁彥俊，〈落馬橋遺址明清遺存發掘的收穫及相關問題〉，《文物》，2020 年 11 期，圖 6：4。墓葬出土包括明景泰五年（1454）內官太監成敬墓出土青花火焰祥雲紋碗、北京海淀區學院路出土明青花人物罐、1975 年四川省綿陽成化元年墓出土的兩件青花麒麟紋盤。首一例，見銅川市考古研究所，〈陝西銅川明內官監太監成敬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7 年 5 期，頁 26-36，圖 6。後兩墓葬例子，見上海博物館編，《灼爍重現：15 世紀中期景德鎮瓷器特集》，圖 229、260-261。

37 傳世例子集中見於上海博物館編，《灼爍重現：15 世紀中期景德鎮瓷器特集》，第四部份〈怡然文風——質樸無華民窯瓷〉，頁 225、229、230、233、234、244、247、248、261；王冠宇編，《填空補白：香港公私收藏明正統、景泰、天順瓷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21），圖 2、3、5、21、27、28、31、32、45、47；十字菱格紋在天順以後民窯器的使用，見圖 71、73、80。

38 秦大樹、高憲平，〈景德鎮明代「空白期」窯業遺存的考古學探索與新認知〉，頁 74。

39 故宮博物院、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編，《明代宣德御窯瓷器：景德鎮御窯遺址出土與故宮博物院藏傳世瓷器對比》，圖 34。國立故宮博物院亦藏有永樂、宣德朝青花蓮塘紋金彩碗及青花蓮塘紋碗等例子。參見黃蘭茵主編，《適於心：明代永樂皇帝的瓷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7），頁 150-153；廖寶秀，《明代宣德官窯菁華特展圖錄》，頁 336-337，圖 141。

趨勢：藩府瓷器內底最多採用 A 型降龍紋，但官窯瓷器的主要樣式為 B 型降龍紋和 B 型升龍紋，少見藩王瓷器所用的 A 型降龍紋和 A 型升龍紋為主紋飾，後兩者都只用於官窯群龍紋瓷。藩府瓷器上的新樣龍紋，又未見於官窯瓷器；再加上十字菱格紋的民間色彩，凡此種種都顯示，藩王府龍紋瓷器的樣式並不是參照當朝官窯瓷器制定。

值得注意的是，2016 年景德鎮中華北路出土一批建築構件，包括一件白釉堆塑龍紋勾頭（圖 22）。⁴⁰ 勾頭的龍紋形態跟 A 型升龍紋相似，雙前爪同置一側，但龍身中部較 A 型升龍紋少一曲，因此身軀不呈「3」字形而呈「S」鏡像。相似的龍紋勾頭，在安徽省鳳陽明中都遺址亦有發現。雖然詳細考古報告尚未發表，但從已發佈的資料可見，明中都不僅採用跟景德鎮中華北路出土一樣形態的龍紋琉璃勾頭，更有以 A 型升龍紋、A 型降龍紋（圖 23）和 B 型降龍紋（圖 24）裝飾的琉璃勾頭。⁴¹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營建明中都始於洪武二年（1369），罷廢於洪武八年（1375），所以上述三種形態的龍紋無疑在明初已是皇室的象徵，用於最高級別的宮廷建築。⁴²

近年，景德鎮落馬橋窯址的考古發掘，亦出土無釉五爪龍紋勾頭殘片，龍紋屬 A 型降龍紋，年代定為洪武朝（1368-1398）。⁴³ 景德鎮落馬橋是明代民窯窯區，針對該窯址及御窯廠遺址兩地出土的洪武朝帶銘板瓦等建築構件，學者已指出它們的產地包括饒州浮梁縣各都，以及饒州轄下其他縣，應該是在多地燒造完成後運至景德鎮珠山集中，之後再轉送至消費地。⁴⁴ 換句話說，景德鎮御窯廠所在的浮

40 景德鎮御窯博物館編，《景德鎮出土明洪武官窯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頁 250-251。

41 張紫贊、劉美子、曹嘉玥，〈鳳陽明中都：考古發現與保護利用「三部曲」〉，新華每日電訊 2022 年 7 月 22 日 http://www.news.cn/mrdx/2022-07/22/c_1310644823.htm（檢索日期：2023 年 9 月 8 日）；王劍英，《明中都研究》（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5），彩版頁 12；王寅寅、邵天禹、王曄、曹穩、宋永偉，〈鳳陽喬澗子遺存磚瓦瓷器及建築圖樣的造物藝術範式考釋〉，《長春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 21 卷第 3 期，頁 85-88，圖 1；張強、李瑞生，〈考古專家發掘廬清安徽明中都遺址前朝主殿及附屬建築佈局〉，《中國新聞網》2022 年 3 月 31 日 <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2022/03-31/9716619.shtml>（檢索日期：2023 年 9 月 8 日）。

42 王劍英，《明中都研究》，頁 104-111。

43 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西景德鎮落馬橋紅光瓷廠窯址明清遺存發掘簡報〉，頁 12，圖 22；翁彥俊，〈景德鎮落馬橋窯址的元明官窯遺存及其啓示〉，《遺產與保護研究》，2017 年增刊，頁 100。

44 翁彥俊，〈景德鎮落馬橋窯址的元明官窯遺存及其啓示〉，頁 100-103；吉薦學、劉龍，〈景德鎮御窯廠遺址明洪武磚瓦產地新考〉，《中原文物》，2022 年 4 期，頁 136-144。

梁縣民窯窯場，在洪武初年已取得皇室的官方龍紋式樣，至少包括 A 型升龍紋、A 型和 B 型降龍紋，為宮廷製作瓷質建築構件。

不過，此種由民窯協力燒造、運送到御窯廠再轉至消費地的操作模式並沒有長期維持，大概在明洪武末年御窯廠製瓷運作成熟後，便改由御窯廠集中燒造。從洪武末至正統朝，中間相隔至少三十年，藩王府瓷器為甚麼重新採用不見於官窯瓷器內底的 A 型升龍紋和 A 型降龍紋？是誰在主導龍紋形態的選用與潮流？

二、龍的形態：主次與潮流

（一）皇帝坐像與藩王遺物展現的龍紋潮流

五爪龍紋首要是皇帝的象徵，如果龍紋的形態有主次、尊卑之分，定義其主次和潮流的人，應該是當朝皇帝。從《明史·輿服志》可知，明代皇帝以至皇后、太子、親王的服飾上皆使用龍紋，不過文獻上只有「龍」、「雲龍」、「盤龍」、「團龍」等記載，而沒有用「升龍」、「降龍」等對龍紋形態特徵的具體描述。⁴⁵不過，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一批原儲於北京紫禁城南薰殿的明代皇帝坐像軸，具體表現皇帝身穿龍袍的形象。⁴⁶過去學者已注意到，畫像中明初皇帝的袍服與出土的藩王龍袍一致，證明畫像的服飾描繪寫實；⁴⁷畫中的皇帝由初期穿著四團龍袍常服，到明英宗後穿十二團龍十二章吉服，而且胸前團龍的形態亦有變化。⁴⁸在此基礎上，本節將研究對象由皇帝胸前的團龍紋，擴展到整張畫像呈現的龍紋系統，透過對比明代前期各皇帝畫像中龍紋的變化，並對照藩王墓出土的龍紋器服，探討藩王府龍紋瓷器的屬性。

45（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 66，〈輿服二〉，頁 1615-1632。

46 有關這批畫作的研究，參見 Cheng-hua Wang, "Material Culture and Emperorhip: The Shaping of Imperial Roles at the Court of Xuanzong (r. 1426-35)"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1998), 148-213; Dora C. Y. Ching,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ing Imperial Image," in *Culture, Courtiers, and Competition: The Ming Court (1368-1644)*, ed. David M. Robins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321-364; 何嘉誼，〈文字紀實？圖像寫真？從文獻與《明孝宗坐像》看明代帝王畫像的寫實性與社會功能〉，《故宮文物月刊》，455 期（2021.2），頁 82-89。

47 石釗釗，〈秘藏的御容——兩件傳世明成祖朱棣像〉，《故宮文物月刊》，455 期（2021.2），頁 70-81。

48 林莉娜，〈明代帝王坐像團龍紋飾之演變〉，《故宮文物月刊》，460 期（2021.7），頁 82-98；石釗釗，〈南薰殿畫像中的衣裳服制〉，《故宮文物月刊》，454 期（2021.1），頁 30-43。

《明太祖坐像》(圖 25a)描繪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他身穿織金四團龍袍,胸前龍紋軀幹成「3」字形(圖 25b),一雙前腿同放一側朝左,後腿跨步朝右,形象為 A 型升龍紋(圖 4a),與景陵王朱孟炤墓出土的青花升龍紋盤如出一轍(圖 2)。⁴⁹此外,明太祖雙肩上的團龍為 A 型降龍(圖 25c),後腿與龍尾不交疊,跟朱孟炤墓出土的另外兩件青花盤上的降龍紋完全相同(圖 1)。畫像上明太祖胸前和兩肩龍紋配置,同樣可見於繪畫明成祖朱棣(1360-1424)的《明成祖坐像》(圖 26a),以及現藏西藏布達拉宮的《成祖朱棣畫像》,後者繪於永樂二年(1404),製作時明成祖四十五歲,兩畫所表現的明成祖年紀相約,應同作於永樂初年。⁵⁰在《明成祖坐像》中,A 型升龍紋不僅見於胸前(圖 26b),更是地毯上密佈的紋樣(圖 26d)。它在全畫中佔主導地位,顯然是皇帝的首要象徵,較龍袍雙肩的 A 型降龍紋更顯尊貴。至於用來裝飾寶座和靠背織物上的行龍則屬次要。同樣的龍紋配置,也見於繪畫明仁宗朱高熾(1378-1425)的《明仁宗坐像》。⁵¹

山東魯荒王朱檀(1370-1390)墓出土的三件四團龍袍之中,有兩件(編號 13.334 和 13.335)採用了相同的龍紋配置,即以 A 型升龍紋置胸前再搭配 A 型降龍紋於雙肩,是此種龍紋配置的實物例證(圖 27a-c)。⁵²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朱檀入殮時身穿的妝金四團龍紋緞袍,胸背和雙肩卻織有另一種升龍紋(圖 28a-b)。⁵³此龍紋兩前腿左右伸張,軀幹仍保持「3」的形態,它正是上文述及的 B 型升龍紋(圖 4b)。明內府本《明宮冠服儀仗圖》中,〈明永樂年冠服圖〉之皇帝常服和親王常服(圖 29a-b),胸前的團龍即用此 B 型升

49 林莉娜主編,《南薰殿歷代帝后圖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20),冊上,頁 192-195。

50 林莉娜主編,《南薰殿歷代帝后圖像》,冊上,頁 206-211;石釗釗,〈秘藏的御容——兩件傳世明成祖朱棣像〉,頁 71-72。

51 林莉娜主編,《南薰殿歷代帝后圖像》,冊上,頁 212-215。

52 山東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魯荒王墓》,冊上,頁 31-34;冊下,圖版 27-28。

53 山東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魯荒王墓》,冊上,頁 29-30;冊下,圖版 26。劉毅指出,從明藩王墓中裝殮較好的幾座墓可見,「大多數明代親王、王妃應該是身著常服下葬」,而不是禮儀用的袞冕或皮弁服。所謂「常服」,永樂三年規定,藩王冠、袍、帶、靴、俱與東宮(皇太子)同,而東宮常服則是「冠、烏紗折角向上巾,亦名翼善冠,親、郡王及世子俱同。袍,赤色。盤領窄袖。前後及兩肩、各金織蟠龍一。帶,用玉。靴,皮爲之」,可見藩王常服前後及兩肩皆飾龍紋。劉毅,《明代藩王陵墓考古學研究》,頁 468;〈明〉李東陽等撰,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臺北:國風出版社,1963),卷 60,〈皇太子冠服冊寶附·常服〉,頁 1039b。魯荒王墓出土的另一件妝金柿蒂窠盤龍紋通袖龍襴緞線袍(13.332)亦同樣裝飾四條 B 型升龍紋。山東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魯荒王墓》,冊上,頁 24-28;冊下,圖版 24-25。

龍紋樣式，不過雙肩仍用 A 型降龍紋。⁵⁴《明宮冠服儀仗圖》彙集明洪武至永樂三年（1405）確定的明代早期冠服制度，由此揭示這種 B 型升龍紋在洪武、永樂宮廷已具有認受性，早於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檀已穿著織有 B 型升龍紋的龍袍下葬。

明代中央朝廷負責為藩王置辦生前和死後重要典禮的儀式器服，冠服以外也包括匣盒。各王府冊封時使用的中方木櫃、婚禮誥命用的匣盒等，皆由工部器皿廠製造。⁵⁵迄今出土的藩王匣盒多出自明初墓葬，其上裝飾的五爪龍紋包括上述的 A 型和 B 型兩種升龍紋。例如，魯荒王墓用於盛放親王寶璽明器的瀝粉貼金雲龍紋木盒，採用 A 型升龍紋（圖 30a-b），而用於置放九旒冕、九縫皮弁等吉服的戩金雲龍紋朱漆大木箱，則繪 B 型升龍紋（圖 31）。⁵⁶鄧靖王朱棟（1388-1414）墓出土描金雲龍紋朱漆大木箱以 A 型升龍紋為飾（圖 32a-b）。⁵⁷楚昭王朱楨（1364-1424）墓出土的雲龍紋石函（圖 33）刻有 A 型降龍紋和 B 型升龍紋，如同《明宮冠服儀仗圖》的皇帝和親王常服上的龍紋配置，而出土時放在石函內的雕五爪龍紋木冊盒（圖 34），前壁浮雕的雙龍為 A 型降龍紋和 A 型升龍紋。⁵⁸這些例子顯示，明初洪武至洪熙朝，A 型和 B 型兩種升龍紋，皆可配搭 A 型降龍紋用於中央朝廷提供予藩王的器用上。更重要的是，皇帝和藩王採用相同形態和配置的五爪龍紋。⁵⁹換言之，御賜的藩王用器並沒有因親王地位低於皇帝而改用四爪龍紋或改變龍紋樣式，明初並不存在藩樣龍紋。

《明宣宗坐像》描繪明宣宗朱瞻基（1399-1435），該畫雖然沿用明太祖創立

54 陳曉蘇主編，《明宮冠服儀仗圖》（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據北京市文物局圖書資料中心藏明代稿本），冊 2，頁 106；冊 3，頁 233。

55 （明）李東陽等撰，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卷 201，〈織造·器用〉，頁 2717a。

56 山東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魯荒王墓》，冊上，頁 96-97、頁 168-169；冊下，圖版 97-98、270-272。

5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荊門市博物館、鍾祥市博物館編著，《鄧靖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頁 107-109，彩版 81。漆木箱內的玉佩飾則刻 B 型升龍紋。

58 石函內置雕五爪龍紋木冊盒，儲放鎏金銅封冊、謚冊等喪禮重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漢市江夏區博物館，〈武昌龍泉山明代楚昭王墓發掘簡報〉，《文物》，2003 年 2 期，頁 13、15-16。

59 五爪行龍紋亦可見於盛裝玉圭儀式器用的描金漆木盒，在魯荒王墓、鄧靖王墓、蜀悼莊世子朱悅嫌（1388-1409）墓皆有出土。山東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魯荒王墓》，冊上，頁 96、98-99；冊下，圖版 99-10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荊門市博物館、鍾祥市博物館編著，《鄧靖王墓》，頁 131-13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館、成都明墓發掘隊，〈成都鳳凰山明墓〉，《考古》，1978 年 5 期，頁 312，圖版 10：1。

的傳統側身坐式，但其龍袍上的團龍形態已有改變：龍袍胸前和雙肩全用升龍紋（圖 35a-b），而且胸前張牙舞爪的升龍形態，似乎是繼承永樂朝而來。⁶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甜白釉暗花五龍紋高足杯（圖 36），內底刻「永樂年製」款，腹壁錐拱的五龍之一的形態跟《明宣宗坐像》胸前團龍幾近一致：⁶¹ 龍首正面偏右，龍頂毛髮右飄，身軀自頭頂伸出從左而右彎成一圈，再從龍首左方由上而下形成一彎，然後在龍首右方彎出向下伸延，龍尾朝左，雙前腿左上右下，五趾張開，雙後腿朝右跨步，本文稱之為 C 型升龍紋。雖然宣德朝官窯瓷器上有不少張牙舞爪的升龍紋，但極少與 C 型升龍紋相同。一如《明成祖坐像》，《明宣宗坐像》的地毯滿佈升龍紋，不過已由 A 型改成 B 型升龍紋（圖 35c）。寶座亦畫滿各種姿態的升龍紋，而 A 型降龍紋則已淪為座墊的地紋（圖 35d）。

明代皇帝畫像到明英宗朱祁鎮（1427-1464）時，在圖式上作出了重要調整：皇帝由側面像改為正面像，服飾亦由四團龍紋常服改為十二龍紋十二章袞服（圖 37a）。⁶² 針對龍紋，明宣宗和明英宗兩幅畫像也各有不同：《明英宗坐像》胸前的團龍是 B 型升龍紋（圖 37b），雙肩用 B 型降龍紋（圖 37c），玉帶以下，上方為 B 型降龍紋，下方是《明宣宗坐像》胸前的 C 型升龍紋的鏡像（圖 37d）。A 型降龍紋不見於畫中袞服，只與 B 型升龍紋搭配成地毯的「升降龍」紋（圖 37e）。A 型降龍紋（圖 37f）和行龍紋仍然是寶座的裝飾紋樣。《明英宗坐像》展示的龍紋系統（圖 38）基本上與其子朱見深（1447-1487）的《明憲宗坐像》相同。⁶³

表一概括明初皇帝坐像、官窯瓷器，及藩王府龍紋瓷器上的龍紋形態變化。總括而言，明皇帝坐像較為保守，傾向沿用前朝已流行的龍紋形態和配置，而官窯瓷器則走在潮流尖端。當洪武至洪熙時期的皇帝座像仍沿用 A 型升龍紋和 A 型降龍紋時，永樂青花官窯瓷器已採用 B 型降龍紋，而甜白釉瓷則用 C 型升龍紋。在此期間，親王龍袍和匣盒混合採用 A 型、B 型升龍紋和 A 型降龍紋。當明宣宗的坐像採用 C 型升龍紋為胸前團龍，並採用 B 型升龍紋為地毯紋樣時，宣德官窯瓷器已採用 B 型升龍紋和 B 型降龍紋裝飾瓷器內底，並將 B 型升龍紋與 A 型降龍紋搭配成「升降龍紋」使用。當明英宗的畫像採用 B 型升龍紋和 B 型降龍紋為龍

60 林莉娜主編，《南薰殿歷代帝后圖像》，冊上，頁 216-221。

6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瓷 006153。

62 林莉娜主編，《南薰殿歷代帝后圖像》，冊上，頁 228-233。

63 林莉娜主編，《南薰殿歷代帝后圖像》，冊上，頁 234-239。

袍主要紋樣，並以 B 型升龍紋與 A 型降龍紋搭配成「升降龍紋」為地毯裝飾時，正統至天順官窯瓷器一直維持 B 型升龍紋和 B 型降龍紋的主紋飾地位，並發展出多種五龍和九龍紋樣。換言之，一朝流行的龍紋形態，先反映在明初極受皇室重視的供御瓷器上，經過當朝的普及使用和認可，便成為下一朝皇帝坐像胸前的龍紋形態。由於《明成祖坐像》繪畫於永樂初年，為延續明太祖奠定的傳統，《明成祖坐像》的龍紋配置更近於《明太祖坐像》。到了明英宗，由於其坐像的繪畫時間很可能已是他第二次擔任皇帝的天順時期，⁶⁴ 因此畫中的龍紋配置，已與當朝的官窯瓷器趨向一致。明皇室主導不同形態的龍紋之主次地位，而主次地位隨時而變，流行過後的龍紋形態從畫像中心移向邊緣，成為遠離權力象徵的裝飾性紋樣，或不再見於畫中（圖 38）。

表一所見，A 型升龍紋和 A 型降龍紋雖然在明太祖、成祖時期曾是最重要的帝皇象徵，但到宣德朝已變得次要，在成化朝之前，兩者皆已在皇帝的龍紋系統中退出或退居邊緣位置。從魯荒王墓出土的龍袍所見，藩王對此龍紋潮流的改變，應該有所掌握，因此魯荒王才會穿著織有 B 型升龍紋的龍袍入殮，而將織有 A 型升龍紋和 A 型降龍紋的兩件袍服隨葬。

表一 明代皇帝畫像、官窯瓷器、藩王府瓷器上的龍紋形態比較

	皇帝坐像		官窯瓷器		藩王龍紋 瓷器
	龍袍	地毯	底心	腹壁	
明太祖 (1328-1398)	A 升 + A 降				
明成祖 (1360-1424)	A 升 + A 降	A 升	B 降 + C 升 (暗花龍紋)		
明仁宗 (1378-1425)	A 升 + A 降				
明宣宗 (1398-1435)	C 升	B 升	B 升 + B 降	B 升 + A 降 (升降龍)	
明英宗 (1427-1464)	B 升 + B 降	B 升 + A 降 (升降龍)	B 升 + B 降	A 升 + B 升 + A 降 (群龍紋)	A 升 + A 降 + B 降
明憲宗 (1447-1487)	B 升 + B 降		B 升 + A 降 + B 降	A 降 (群龍紋)	

64 Wang, "Material Culture and Emperors: The Shaping of Imperial Roles at the Court of Xuanzong (r. 1426-35)," 201.

(二) 藩王府龍紋瓷器的性質

本文開首已指出，藩王府龍紋瓷器的主要特徵是盤內底有升龍或降龍紋，並大多以十字菱格紋裝飾口沿。兩個特點見於不同藩國的王親墓葬和王府遺址出土的瓷器，甚至延續至十六世紀上半葉。基於此觀察，升或降龍紋搭配十字菱格紋的設計，當是十五世紀藩王階層共同認可的龍紋瓷器樣式。

其次，綜合上面各部份的分析，十五世紀的藩王龍紋瓷器採用了三種官樣龍紋，⁶⁵即A型升龍紋、A型和B型降龍紋，但與此同時，亦展現出明顯的非官方製器的特點，包括：一，瓷器上有官方從未使用過的新樣升龍紋；二，瓷器上偶見四爪龍紋，而明廷從未因藩王地位低於皇帝而改變龍紋的形態或製造四爪龍紋器物給予藩王。中央朝廷為藩王府製造的器服，皆採用當朝龍紋樣式；三，藩府瓷器採用的A型升龍紋和A型降龍紋，都是洪熙朝以後明朝廷不再採用，或淪為次等的裝飾性紋樣，換言之，藩府瓷器上的龍紋形態與當朝皇帝主導的龍紋潮流脫節；四，十字菱格紋是廣為景德鎮工匠認識的瓷器邊飾，常見於元代青花及明中期的民窯青花瓷，但明初中期的官窯瓷器甚少採用；五，龍紋配十字菱格紋的裝飾組合雖早見於元青花，卻罕見於明初中期的官窯瓷器。以上種種情況，令人懷疑藩王府龍紋瓷器，最初並非由內府提供指定式樣。

筆者認為，藩府龍紋瓷器最初可能是個別藩王府或在地方官員協助下到景德鎮少數有能力生產高質素瓷器的民窯訂製或購置。⁶⁶及後，或許是得到皇帝默許，由此獲得藩王階層認可和採購。瓷器上的龍紋形態，或是依據藩王器服上的官樣，或是景德鎮民窯採用明初製作官方建築構件或瓷器存留的樣式，無論如何，其造型並不規範，並且搭配了十字菱格邊飾。如此設計的藩王府龍紋瓷器，既以五爪龍紋滿足藩王凸顯皇室身份的目的，同時亦避免冒犯皇帝或被指責意圖叛逆。

65 筆者感謝匿名評審的提醒，此三種龍紋亦為官樣。

66 明代藩王府事務大部份由州府或親王府官員承辦，遠多於中央朝廷部門。針對「親王造墳」一項，劉毅就曾指出「在制度層面上，明代王墓的修造通常是由朝廷委派工部等衙門的中低級官員主持，但實際工作大多是王府所在布政司或州府等地方官員的兼差，有時王府官員也參與期間，……在各種地方志中真正由朝廷委派禮部、工部等中央官吏直接督造王墓的事例并不多，或許如前揭《禹縣志》所載，實際主其事的是各王府官員，這也是各地王墓面貌差異很大的一個主要成因。」自明初以來，明朝廷已就藩王造墳定下制度，但實際操作時，本屬中央官員的任務，也往往是由地方官員或藩王府承擔。劉毅，《明代藩王陵墓的考古學研究》，頁38-39。

事實上，迄今尚未發現任何明朝廷為藩王提供日用瓷器的記載，亦沒有內府為藩王制定日用瓷器樣式的條文。明朝官方文獻有關藩王瓷器的記載只涉及祭器。《明宣宗實錄》卷9記「洪熙元年九月己酉」（1425年10月24日）：「己酉，命行在工部於江西饒州府造奉先殿太宗皇帝几筵、仁宗皇帝几筵白磁祭器，於磁州造趙王之國各壇祭器。」⁶⁷《明史》卷82〈食貨六·燒造〉亦載：「宣宗始遣中官張善之饒州，造奉先殿几筵龍鳳文白瓷祭器，磁州造趙府祭器。」⁶⁸兩條文獻指涉同一事件，即洪熙元年（1425年）趙王朱高燧（1383-1431）在就藩彰德（今河南安陽）後，請旨給予「趙王之國，其社稷山川祭器、樂器、冠服之屬」。⁶⁹在明宣宗同意下，工部在饒州（景德鎮）為明太宗和明仁宗的靈座燒造白瓷祭器，並在磁州造趙國各壇祭器。此記載無疑只涉及瓷質祭器，而且趙藩祭器的燒造地點並非御窯廠所在的景德鎮，而是為明朝廷供應缸罈瓶之屬，並與趙藩同處於河南彰德府的磁州窯。⁷⁰官方燒造藩府祭器尙且在地方窯場了事，要論證明朝廷主動組織景德鎮窯場為藩王府燒造官方未有承諾置辦的日用瓷器，似乎還需要更多證據。⁷¹

藩王為皇室成員，藩府瓷器又採用官樣龍紋，但這些瓷器的生產地卻在景德鎮民窯窯區，成品亦帶有諸多非官方製品的特質，因此過去有學者稱此類瓷器「亦官亦民」，形容實在貼切。這類兼備官、民窯特質的龍紋瓷器的生產，很可能是在皇帝的默許下進行。

三、五爪與四爪：藩王使用龍紋的規制與案例

文首提及，五爪龍紋自元代以來明文禁止官民使用，因此過去論及十五世紀藩王府龍紋瓷器，往往認為是由中央朝廷組織製造，或屬皇帝賞賜。不過，具體

67（明）楊士奇等纂修，《明宣宗章皇帝實錄》，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9，洪熙元年九月己酉條，頁231。

68（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82，〈食貨六·燒造〉，頁1998。

69（明）楊士奇等纂修，《明宣宗章皇帝實錄》，卷3，洪熙元年七月上辛未條，頁74。

70（明）李東陽等撰，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卷194，〈窯冶·陶器〉，頁2631b-2632a。

71 明中晚期文獻有關藩王用瓷的記載亦只涉及祭器。《大明會典》卷208載「瓷酒尊、蓬豆、簠簋，行江西浮梁縣燒造」和《太常續考》卷2「親王合用祭器，白磁登、銅八箇，簠簋、蓬豆、碟九十六箇，磁爵十二箇」，兩條文獻涉及的藩王用瓷皆屬祭器。（明）李東陽等撰，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卷208，〈都水清吏司〉，頁2773b。（明）《太常續考》，收入《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影印），冊599，卷2，頁57b。《太常續考》成書於明崇禎（1628-1644）年間。

針對藩王階層製造和使用龍紋器物的討論卻十分有限，不少研究以為，藩王和官民僭用龍紋始於嘉靖朝，且經常將此現象與十六世紀嘉靖朝御用瓷器官搭民燒的制度扯上關係。事實上，明代自洪武朝起，歷朝皇帝對皇親製造和使用龍紋的態度，一直截然有別於「官民」同類行為：對前者寬，對後者嚴。本節將從文獻角度，闡釋明朝官民和藩王使用龍紋的規制和案例，藉以釐清過去對藩王製造五爪龍紋瓷器的誤解。

明太祖開國，繼承元室禁止官民使用五爪龍紋的規定，並且確立僭用的罰則，影響深遠。明洪武元年（1368）制定《大明令》，重申並細化了龍紋禁令：「衣服并不得用金繡五爪龍紋。官一品、二品服渾金花，三品、四品服金搭子，五品服金袖膝襴，六品以上許服四爪龍，七品以下文官不許龍鳳文，止服金六花，八品、九品服金四花。」⁷²五爪和四爪明初皆稱龍紋，前者官民皆不得用，後者六品以上可用，而七品以下官民禁用。

明初確立的《大明律》中，僭用五爪和四爪龍紋的罰則並無區別：「若僭用違禁龍鳳文者，官民各杖一百，徒三年。工匠杖一百，連當房家小，起發赴京，籍充局匠。違禁之物並入官。首告者，官給賞銀五十兩。若工匠能自首者，免罪，一體給賞。」⁷³僭用龍紋的官民及工匠連同家人，都會受杖打、監禁勞役並充入匠籍等懲罰。朝廷又重賞自首的工匠和舉報僭用者，杜絕僭用。

洪武三年（1370）中書省又重申禁令，要求「官民器服不得用黃色為飾，及彩畫古先帝王、后妃、聖賢人物故事、日月龍鳳、獅子、麒麟、犀象之形，如舊有者，限百日內毀之。」⁷⁴不過，該禁令顯然未得到確切執行，洪武六年（1373）又再次申禁：「御賜者許用，既弊不許托此再造」，禁官民在御賜外使用和私造龍紋器服。⁷⁵洪武二十四年（1391），相關龍紋的禁令已具體至「官員人等衣服帳幔，並不許用玄黃紫并織錦龍鳳文」；「官民人等所用金銀磁碗等器，並不許製造龍鳳文」；「官民人等所用床榻，不許雕刻龍鳳并硃紅金飾，床帳不許用玄黃紫及

72（明）李善長纂，《大明令》，北京圖書館藏明鎮江府丹徒縣刻皇明制書本，不分卷，頁20b。

73（明）應槩，《大明律釋義》，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廣東布政使司刻本影印），冊863，卷12，頁93-94。

74（明）董倫等纂修，《明太祖高皇帝實錄》，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55，洪武三年八月丁丑條，頁1079。

75（明）董倫等纂修，《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81，洪武六年四月癸巳條，頁1464。

織繡龍鳳文」。⁷⁶

反覆申禁，只說明官民僭用和私造龍紋器服從未杜絕。明洪武朝的官方文獻載有不少官民僭用龍紋的案例。例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袁州府宜春縣民李某，「妄稱彌勒佛，發九十九等紙號，因聚眾謀作亂」，被告發逮捕並治罪「戍卒」（發到邊疆戍守）。他偽造木印、龍鳳日月袍等百餘事，被視為圖謀叛逆的眾多罪證之一。⁷⁷事實上，明初官民勳貴被指控叛國謀反，罪證往往包括私造或使用龍紋器服。如洪武年間的胡惟庸案和藍玉案，兩案的主犯皆被指僭用飾有金龍紋的織物。⁷⁸天順四年（1460）總兵官石亨因謀叛下獄被籍沒家貲，搜出「動以萬計器服，類多用龍鳳」；⁷⁹成化十三年（1477）太醫院事左通政方賢被搜出「家藏御墨并龍鳳器」，因違法得罪，被謫戍遼東。⁸⁰由於明初官民僭用龍紋的記載，多羅列於他們謀反作亂的罪行之中，因此犯禁者皆受極嚴厲處罰，而該等處罰都不只針對僭用龍紋一事。五爪龍紋既為明代皇室的象徵，在皇帝之外製造和使用龍紋最大的危險，就是被指懷有謀反叛逆當朝皇帝的野心。

至於藩王使用龍紋，亦可分為皇帝賞賜和私造兩種情況。藩王使用皇室賞賜的五爪龍紋器服，可見於《朝鮮王朝實錄》。朝鮮世宗三十一年（1449，明正統十四年），世宗在討論世子儀仗時曾言：「昔予服四爪龍衣，後聞中朝親王服五爪龍，予亦服之，以待天使，其後，帝賜五爪龍服。」⁸¹至朝鮮世祖二年（1456，明景泰七年），大臣金何啓就世子冠服又有相似言論：「臣在世宗朝，累赴京師，詳考《大明集禮》。皇帝袞龍袍上，左肩有日，右肩有月，自皇太子、親王、郡王袞龍袍上，皆用五爪龍。今世子未受命，姑用四爪龍，以存謙讓之意。」⁸²在大明皇朝，由皇帝、皇太子到親王、郡王皆穿著五爪龍紋袍服，這類五爪龍袍屬皇帝賞

76（明）董倫等纂修，《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209，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己未條，頁3114、3117-3118。

77（明）董倫等纂修，《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182，洪武二十五年六月丁酉條，頁2746-2747。

78（明）董倫等纂修，《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243，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乙亥條，頁3529。

79（明）陳文等纂修，《明英宗睿皇帝實錄》，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312，天順四年二月甲寅條，頁6545。

80（明）劉吉等纂修，《明憲宗純皇帝實錄》，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166，成化十三年五月辛巳條，頁3012。

81（朝鮮李朝）《世宗實錄》，收入《李朝實錄》，冊9（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7），卷125，三十一年九月己卯條，頁19a。

82（朝鮮李朝），《世祖實錄》，收入《李朝實錄》，冊6，卷3，二年三月庚寅條，頁22b-23a。

賜。上文提及山東魯荒王朱檀墓出土的五爪龍袍，以及江西益宣王朱翊鉞（1537-1603）墓出土的一件雙肩及胸背皆縫有五爪正面團龍補子的官服，同屬明代親王五爪龍袍的實物例子。⁸³

藩王私造五爪龍紋器服，洪武年間有一則重要案例，見於《太祖皇帝欽錄》。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太祖次子秦愍王朱榑（1356-1395）病逝。明太祖在祭秦王的祝文中，羅列他生前犯下的28項罪，其中第15項為「製造后服與偏妃鄧氏穿著，又做五爪九龍床如大殿御座之式，且前代藩王只用四爪龍床。爾乃如此僭分無禮，罪莫大焉」。⁸⁴從上文記洪武二十四年的禁令可知，官民製造龍鳳紋床是明令禁止的。明太祖的祭祝文指責，秦愍王製造和使用五爪龍床屬「僭分無禮」，所犯的罪惡「論以公法，罪不容誅」。⁸⁵然而，明太祖並沒有在秦愍王生前予以懲罰，而是在他死後「令爾眷屬不與終服，仍敕有司淺葬，降用公禮」，降低他的葬禮規格，並且不許親眷服喪。雖然秦愍王死後因罪受罰，但明太祖沒有將他僭用龍紋跟叛逆扯上關係，更沒有為此懲處其他涉事者，處理手法仍算包容。由此可知，明初藩王不許私造五爪龍紋器服，不過明太祖對藩王僭用五爪龍紋採取寬容態度，並無即時懲處。

十五世紀中的明英宗、明景帝統治時，藩王私造和僭用龍紋再次見於官方文獻，而兩朝皇帝也是採取包容的態度，在調解訴訟時仍傾向寬恕不治。例如，正統五年（1440）明英宗在審理靖江王佐敬與奉國將軍佐敏兄弟間的相互誣陷控訴時，曾指責靖江王佐敬犯下使用「銀買羅段等貨及織金龍鳳段匹」等逾制違法事，不過即使犯罪，英宗仍然包庇靖江王，稱：「今以親親之故，姑置不問。王自今宜深思速改，修德務善，整肅宮闈，親睦同氣，去暴戒利，庶幾祖宗鑒佑，富貴可保，不然悔無及矣」，表明因親屬情誼之故，不依法懲處。⁸⁶相似地，景泰三年（1452）明景帝審理華陽王府鎮國將軍友璧與華陽王友輝兄弟二人的互相指控，對於華陽王被指在「殿宇牀座諸器僭飾龍鳳日月」等違規行為，仍然是

83 江西省文物工作隊，〈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鉞夫婦合葬墓〉，《文物》，1982年8期，頁16-24；江西省博物館、南城縣博物館、新建縣博物館、南昌市博物館，《江西明代藩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頁135，彩版67：2。

84（明）明太祖，《太祖皇帝欽錄》，收入中國明史學會、鳳陽縣人民政府編，《明太祖與鳳陽：中國明史學會會議論文集》（合肥：黃山書社，2011），頁690。

85（明）明太祖，《太祖皇帝欽錄》，頁691。

86（明）陳文等纂修，《明英宗睿皇帝實錄》，卷70，正統五年八月庚寅條，頁1360-1363。

「念其至親，姑宥不治，但遣勅切戒之」，念在華陽王的至親身份，恕不追究，只敕令改正。⁸⁷

寬容藩王的政策，至明末仍然大體上維持。天啓五年（1625）審訊明世宗親甥李承恩僭用五爪龍袍的案件中，司官曾提及「若依僭用龍鳳文者律，似為太輕」，且皇親亦受「八議」條例保護。⁸⁸所謂「八議」，即「一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功，四曰議賢，五曰議能，六曰議勤，七曰議貴，八曰議賓」，此八類人等若有犯罪，其犯罪事實須先封奏皇帝，取得皇帝御准後方可緝拿、審問，而最終量刑亦由皇帝裁決。⁸⁹「八議」中的第一類「議親」，即指皇親國戚，當中包括藩王等都受「八議」條例保護。⁹⁰自明太祖以來，歷朝皇帝對非意圖謀反叛逆的藩王僭用行為，一直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皇帝既然寬容包庇，在「八議」的保護下，臣下就更不容置喙。

綜上所見，明代自開國以來，官民一直不許製造五爪龍紋器服，只有在皇帝恩賜的情況下方可使用。雖然官民僭用龍紋器會受懲處，但自明中期以後，犯禁者不絕。相較而言，藩王作為皇帝至親家屬，本來就配用五爪龍紋器服。但在朝廷規制和皇帝賞賜之外製造五爪龍紋用器，則是「灰色」模糊地帶。明太祖立下先例，一方面容許藩王製造四爪龍紋器用，另一方面對私造並使用五爪龍紋器服的藩王不予重罰。十五世紀中以後，藩王府製造龍紋器服的情況更為普遍，而且在「八議」條例的保護下，亦沒有藩王因私造龍紋器服受到懲處，只有在被控訴時才會遭到皇帝勸戒。如此包容的氣氛，無疑為藩府五爪龍紋瓷器的出現，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本文正是基於上述認識，提出藩王府龍紋瓷器的生產，很可能是在當朝皇帝的包容和默許下進行。

十五世紀的藩府五爪龍紋瓷器，採用了具裝飾性的次要龍紋形態，並加上民窯常用邊飾十字菱格紋，讓使用者在炫耀其超然於官民紳勳的皇室身份之餘，亦傳達出無意跟供御瓷器媲美、遠離權力中心的訊息，藉此減少與圖謀叛逆等嚴重

87（明）陳文等纂修，《明英宗睿皇帝實錄》，卷 212，景泰三年正月甲寅條，頁 4566-4567。

88（明）溫體仁等纂修，《明熹宗愍皇帝實錄》，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57，天啓五年三月丁丑條，頁 2659。

89 此八類人等，除了觸犯十惡之罪，其餘情況皆受「八議」條例保護。（明）應禎，《大明律釋義》，卷 1，頁 12。

90（明）應禎，《大明律釋義》，卷 1，頁 12。

罪行扯上關係的可能。相類似的折衷手法，可見於三件採用 B 型降龍紋的藩王府瓷器：成都蜀王府宮城遺址出土的青花龍紋盤，底心雖然用當朝流行的 B 型降龍紋，不過該龍紋各腿只有四趾而非五趾（圖 11）；湖北武漢江夏流芳明王室墓群出土的「天順年置」青花碗和同墓群出土的高足杯（圖 9-10），外壁不採用一般的行龍紋，改用四條海水蛟龍，再加上器內底用 B 型降龍紋，明顯是模仿宣德款青花雲龍紋碗（圖 39），不過其外口沿加飾十字菱格紋一周，表達出訂製者既想模仿官樣，同時並非冒充官窯瓷器的曖昧意圖。⁹¹ 這種介於官窯與民窯之間的瓷器，正是明代中期一方面皇帝對藩王及親屬相對包容，另一方面社會控制尚未完全鬆弛的情況下的產物。

四、民窯復興與藩王參與

十五世紀中期民窯生產力逐漸提升，為藩王府龍紋瓷器的最終出現提供了物質基礎。從《明英宗實錄》記載的事實和禁令所見，自正統朝以來，景德鎮民窯在生產技術和產品質量上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

正統元年九月乙卯（1436）：江西浮梁縣民陸子順進磁器五萬餘件，上令送光祿寺充用，賜鈔償其直。⁹²

正統三年十二月丙寅（1439）：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窯場燒造官樣青花白地瓷器於各處貨賣及饋送官員之家，違者正犯處死，全家謫戍口外。⁹³

正統十二年九月戊戌（1447）：禁約兩京并陝西、河南、湖廣、甘肅、大同、遼東沿途驛遞、鎮店、軍民、客商人等，不許私將白地青花瓷器皿賣與外夷使臣。⁹⁴

正統十二年十二月甲戌（1448）：禁江西饒州府私造黃、紫、紅、綠、

91 蔡路武，〈湖北明代「空白期」瓷器研究〉，頁 64-66、圖 14、18。宣德官窯器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瓷 007792。廖寶秀，〈明代宣德官窯菁華特展圖錄〉，圖 139。

92（明）陳文等纂修，《明英宗睿皇帝實錄》，卷 22，正統元年九月乙卯條，頁 444。

93（明）陳文等纂修，《明英宗睿皇帝實錄》，卷 49，正統三年十二月丙寅條，頁 946。

94（明）陳文等纂修，《明英宗睿皇帝實錄》，卷 158，正統十二年九月戊戌條，頁 3074。

青、藍、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諭其處，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遲處死，籍其家貲，丁男充軍邊衛，知而不以告者，連坐。⁹⁵

上述四條記載，清楚顯示明正統初年，景德鎮民窯產品的素質已達到可用於宮廷日常餐飲和筵宴的水平，而且數量亦足以供應浮梁縣民一次上貢五萬餘件。至遲在正統三年，景德鎮民窯已大量生產官樣青花瓷器，而且數量已達至可到各處售賣並送予官員之家的程度。及至正統十二年，民窯青花瓷的銷售對象已擴展至「外夷使臣」，外銷市場擴大，參與販賣者不乏驛遞、鎮店、軍人、平民、客商等各類人士，與此同時，產品種類亦涵蓋青花及多色釉瓷。從明朝廷下達的禁令和越發嚴厲的懲罰（由正統三年「違者正犯處死，全家謫戍口外」，到正統十二年「首犯凌遲處死，沒收家財，丁男充軍，知而不告者連坐」）可知，景德鎮民窯瓷器的銷售利潤一定極為可觀，以至窯業者雖然個人生命和家族存亡受到威脅，仍願意冒險繼續生產。

近年的考古發掘，亦從實物層面證明了景德鎮鎮區民窯自正統朝開始進入高速發展期。2012 至 2017 年期間，江西景德鎮落馬橋窯址的考古發掘出土明初到清末民窯遺存的連續堆積，從第一期洪武至宣德朝（1368-1435）到第二期正統至天順朝（1436-1464），窯業產品從白釉瓷主導兼有少量紅綠彩和釉裡紅瓷，轉變成以青花瓷為大宗，器類亦較第一期大為豐富，證明「青花瓷取代白瓷走向規模化生產應從宣德以後的『空白期』開始。」⁹⁶

落馬橋窯址雖然沒有出土藩王府龍紋瓷器，但第二期地層出土青花三爪行龍海水紋罐殘片，該罐領部繪十字菱格紋，紋飾配搭與本文討論的龍紋瓷器相似，年代屬明正統至天順朝（圖 20）。⁹⁷ 事實上，落馬橋元代晚期地層出土有青花五爪龍紋碗腹部殘片、三爪行龍紋高足杯、帶十字菱格紋邊飾的青花盤和器蓋殘片。⁹⁸ 1980 年元代窯址亦曾出土青花盤龍紋花口盤（圖 40），盤內底繪與 A 型降

95（明）陳文等纂修，《明英宗睿皇帝實錄》，卷 161，正統十二年十二月甲戌條，頁 3132。

96 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西景德鎮落馬橋紅光瓷廠窯址明清遺存發掘簡報〉，頁 29-32、34。

97 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西景德鎮落馬橋紅光瓷廠窯址明清遺存發掘簡報〉，頁 13-14，圖 27。

98 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西景德鎮落馬橋窯址宋元遺存發掘簡報〉，《文物》，2017 年 5 期，頁 32，圖 57、59、62。

龍紋相似的三爪龍紋。⁹⁹ 這些考古實物顯示，明正統朝景德鎮鎮區民窯，是在元代窯業基礎上，因應明中期的社會潮流和消費需求再次大量生產青花瓷。本文討論的藩王府龍紋瓷器，很可能始於明中期民窯大發展期的開端，一方面延續了元代青花瓷的常用邊飾和設計，同時在五爪龍紋的處理上亦處於試探階段，表現出保守和謹慎的傾向。

從使用者的角度看，景德鎮民窯復興，為五爪龍紋用器的供應提供了御賜以外的新可能。迄今發現最早有藩王府龍紋瓷器的紀年墓主，是楚藩郡王朱孟炤，其父乃楚昭王朱楨。朱楨生於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1364），明洪武三年（1370）冊封楚王，洪武十四年（1381）就藩武昌，永樂二十二年（1424）薨。孟炤為楚昭王第八子，洪武二十六年（1393）生。他出生時父親已就藩湖廣武昌逾十年，他在藩國出生，未嘗在北京皇城生活。他於永樂二年（1404）冊封景陵王，楚昭王去世時，年約三十，正值壯年，理應有參與楚昭王於永樂二十二年（1424）舉行的葬禮。楚昭王墓室出土的石壙誌（圖 41）、石函（圖 33）、塗金漆木盒和木冊盒（圖 34），全以行龍、升龍和降龍紋為飾。相較之下，景陵王朱孟炤墓出土的器物中，僅本文討論的三件瓷盤帶有龍紋裝飾。¹⁰⁰

事實上，已發掘的明中期親王、郡王等墓葬，罕見有類似明初藩王墓出土、明顯由中央朝廷製造的匣盒、冊盒等五爪龍紋禮儀器用，尤其是郡王、將軍、中尉等墓葬出土更少。這些墓主由於是親王後裔，絕大多數成長於藩國，不得擅自到北京宮廷，與皇帝的關係疏離，因此較少機會獲得皇帝賞賜，此亦昭合明中期藩王親屬墓少有出土五爪龍紋器用的情況。正是對五爪龍紋器用的渴求，推動本已需要自行購置日用瓷器的藩王府，投入到龍紋瓷器的燒造活動。如近年四川成都蜀王府宮城遺址的考古發掘，出土大量明初至中期日用瓷器殘片，除本文探討的青花龍紋碗和盤外，亦發現白釉褐彩龍紋盤，盤內底繪 A 型降龍紋，內腹壁繪波濤紋。這些白釉褐彩瓷器的燒造地未明，初步定為四川窯口產品（圖 42）。¹⁰¹

99 湖北省博物館編，《浮梁翠色：江西景德鎮元明青花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頁 74。有關龍紋在文物尤其瓷器上的發展，見謝明良，〈龍與龍珠〉，頁 83-130、378-382；林業強，〈飛龍在天：再論大維德花瓶〉，《美成在久》，2015 年 5 期，頁 44-59；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雲行雨施：中國龍文物》（香港：香港東方陶瓷學會、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19）。

100 惜景陵王朱孟炤墓早年被盜，因此無法得知墓室的原來情況。

101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景德鎮陶瓷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著，《成都東華門明代蜀王府遺址出土瓷器》，頁 274；秦大樹、高憲平，〈景德鎮明代「空白期」窯業遺存的考古學探索與新認知〉，頁 74。

這些出土瓷器表明，明中期不單景德鎮有生產五爪龍紋瓷器，地方窯場亦有燒造，以滿足藩王府對五爪龍紋瓷器的需求。

五、總結

本文從實物和文獻兩個角度，探討明中期藩王府龍紋瓷器的屬性和生產原因。通過考察藩王府瓷器、官窯瓷器、皇帝坐像和藩王墓等考古出土遺物上的五爪龍紋形態，本文嘗試重構明朝上半葉由皇帝主導的龍紋形態變遷與潮流，並以此為參照，闡明藩王府龍紋瓷器「亦官亦民」的性質：它雖然採用官樣龍紋，但又選擇已退居次位或不再為當朝所用的龍紋形態、不見於官窯的新樣龍紋，及地位較低的四爪龍紋，並以民間流行的十字菱格紋為邊飾，且在景德鎮民窯窯區生產。本文因而認為，這類藩府瓷器最初很可能是個別藩王府或在地方官員協助下到景德鎮少數有能力燒造高質素瓷器的民窯訂製或購買，及後在皇帝的默許下，得到藩王階層普遍認可並且廣為購置採用。這種結合龍紋和十字菱格紋的瓷器設計，表達藩王低於皇帝，卻超然於臣民之上的社會地位。

明代文獻有關藩王私造五爪龍紋器服的記載，亦呈現出皇帝對此類行為的包容曖昧態度。在十五世紀中期景德鎮民窯生產復興的有利條件下，藩王府龍紋瓷器應運而生，並銷售到湖北、山東、四川等各地供藩王府使用。

本文以五爪龍紋為主要研究對象。由於五爪龍紋象徵皇帝的概念已深植於中國藝術史研究者的心中，因此過往對於此紋飾的解讀往往比較單一，更多集中關注龍紋的細節變化以鑑定其載體年代。本文重新檢視幾種有可靠紀年的材質上的五爪龍紋，嘗試按龍紋的不同形態細緻分類，通過探討不同材質上各種龍紋形態的發展與交替流行的情況，考察使用者取用特定形態龍紋的背後動機與考量，以及與明代社會發展的關係。事實上，大部份龍紋形態在明代以前已經存在，因此研究的重點不在於龍紋造型的創新，而是使用群體對不同形態龍紋的選取和應用，所反映對圖像的詮釋及產生的社會意義，特別是與其身處的經濟條件和物質文化的關係。我們是否可以透過龍紋在明代物質文化的表現，看見不同使用群體的關懷與面貌？本文研究明中期藩王府龍紋瓷器，也是對此問題的初步探索。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元) 陳高華、張帆、劉曉、黨寶海點校，《元典章》，北京：中華書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據 1972 年臺灣故宮博物院影印元刻本。
- (明)《太常續考》，收入《四庫全書》，冊 59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影印。
- (明) 李東陽等撰，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臺北：國風出版社，1963。
- (明) 李善長纂，《大明令》，北京：北京圖書館藏明鎮江府丹徒縣刻皇明制書本。
- (明) 宋濂等撰，《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據洪武九十九卷本和南監本。
- (明) 明太祖，《太祖皇帝欽錄》，收入中國明史學會、鳳陽縣人民政府，《明太祖與鳳陽：中國明史學會會議論文集》，合肥：黃山書社，2011。
- (明) 陳文等纂修，《明英宗睿皇帝實錄》，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明) 陳曉蘇主編，《明宮冠服儀仗圖》，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據北京市文物局圖書資料中心藏明代稿本。
- (明) 楊士奇等纂修，《明宣宗章皇帝實錄》，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明) 董倫等纂修，《明太祖高皇帝實錄》，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明) 溫體仁等纂修，《明熹宗愍皇帝實錄》，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明) 劉吉等纂修，《明憲宗純皇帝實錄》，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明) 應價，《大明律釋義》，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冊 86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廣東布政使司刻本影印。
- (清) 張廷玉等撰，《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據清武英殿本。
- (朝鮮李朝)《世宗實錄》，收入《李朝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7。

近代論著

- 丁鵬勃，〈明代藩王墓出土瓷器研究〉，《中國歷史文物》，2008 年 1 期，頁 48-64。
- 山東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魯荒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 上海博物館編，《灼爍重現：15 世紀中期景德鎮瓷器特集》，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

- 王冠宇編，《填空補白：香港公私收藏明正統、景泰、天順瓷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21。
- 王冠宇、江建新主編，《填空補白 II：考古新發現明正統、景泰、天順御窯瓷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19。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館、成都明墓發掘隊，〈成都鳳凰山明墓〉，《考古》，1978 年 5 期，頁 306-313、366-370。
- 王寅寅、邵天禹、王曄、曹穩、宋永偉，〈鳳陽喬潤子遺存磚瓦瓷器及建築圖樣的造物藝術範式考釋〉，《長春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 21 卷第 3 期，頁 85-88。
- 王劍英，《明中都研究》，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5。
-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編著，《景德鎮出土明代御窯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 石釗釗，〈秘藏的御容——兩件傳世明成祖朱棣像〉，《故宮文物月刊》，455 期，2021 年 2 月，頁 70-81。
- 石釗釗，〈南薰殿畫像中的衣裳服制〉，《故宮文物月刊》，454 期，2021 年 1 月，頁 30-43。
- 江西省文物工作隊，〈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鉞夫婦合葬墓〉，《文物》，1982 年 8 期，頁 16-28。
-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編著，《明代淮王府遺址出土瓷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20。
- 江西省博物館、南城縣博物館、新建縣博物館、南昌市博物館，《江西明代藩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成都東華門明蜀王府宮城苑囿建築群發掘簡報〉，《文物》，2020 年 3 期，頁 11-38。
-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景德鎮陶瓷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著，《成都東華門明代蜀王府遺址出土瓷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22。
- 吉篤學、劉龍，〈景德鎮御窯廠遺址明洪武磚瓦產地新考〉，《中原文物》，2022 年 4 期，頁 136-144。
- 何嘉誼，〈文字紀實？圖像寫真？從文獻與《明孝宗坐像》看明代帝王畫像的寫實性與社會功能〉，《故宮文物月刊》，455 期，2021 年 2 月，頁 82-89。
- 林莉娜，〈明代帝王坐像團龍紋飾之演變〉，《故宮文物月刊》，460 期，2021 年 7 月，頁 82-98。
- 林莉娜主編，《南薰殿歷代帝后圖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20。
- 林業強，〈飛龍在天：再論大維德花瓶〉，《美成在久》，2015 年 5 期，頁 44-59。
- 武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漢市江夏區博物館，〈武漢江夏二妃山明景陵王朱孟炤夫婦墓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10 年 2 期，頁 46-56。

- 柯律格 (Craig Clunas), 黃曉鵬譯,《藩屏：明代中國的皇家藝術與權力》，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
- 故宮博物院、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編,《明代宣德御窯瓷器：景德鎮御窯遺址出土與故宮博物院藏傳世瓷器對比》，北京：故宮出版社，2015。
- 故宮博物院、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編,《明代正統、景泰、天順御窯瓷器：景德鎮御窯遺址出土與故宮博物院藏傳世瓷器對比》，北京：故宮出版社，2019。
- 故宮博物院、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編,《明代成化御窯瓷器：景德鎮御窯遺址出土與故宮博物院藏傳世瓷器對比》，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雲行雨施：中國龍文物》，香港：香港東方陶瓷學會、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19。
- 秦大樹、高憲平,〈景德鎮明代「空白期」窯業遺存的考古學探索與新認知〉,《中國陶瓷》,56卷9期,2020年9月,頁63-77。
- 秦大樹、高憲平、翁彥俊,〈落馬橋遺址明清遺存發掘的收獲及相關問題〉,《文物》,2020年11期,頁48、79-96。
- 陸明華,〈明正統、景泰、天順景德鎮瓷器及相關問題〉,收入上海博物館編,《灼爍重現：15世紀中期景德鎮瓷器特集》，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頁9-25。
- 翁彥俊,〈景德鎮落馬橋窯址的元明官窯遺存及其啓示〉,《遺產與保護研究》，2017年增刊,頁94-103。
- 宮崎市定,〈關於二角五爪龍〉,收入張學鋒、尤東進、馬雲超、童嶺、楊洪俊、張紫毫譯,《中國的歷史思想——宮崎市定論中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頁169-182。
- 高憲平、曹建文,〈內御外藩：15世紀越南官窯瓷器生產——兼與明早期藩王瓷器比較〉,收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景德鎮陶瓷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著,《成都東華門明代蜀王府遺址出土瓷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22，頁348-360。
- 陳燮君、陳克倫主編,《幽藍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集（修訂本）》，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2。
- 張科,〈明代五爪龍紋瓷的使用及相關問題〉,《東南文化》，2018年4期,頁75-81。
- 張瑋恬,〈明代藩王功臣墓出土至正樣式青花器的年代問題〉,《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42期,2017年,頁91-156。
- 張睿洋,〈明代藩王墓出土瓷器斷代分期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論文，2016。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漢市江夏區博物館,〈武昌龍泉山明代楚昭王墓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2期,頁4-18。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荊門市博物館、鍾祥市博物館編著，《郢靖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 湖北省博物館編，《浮梁翠色：江西景德鎮元明青花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 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西景德鎮落馬橋紅光瓷廠窯址明清遺存發掘簡報〉，《文物》，2020 年 11 期，頁 4-36。
- 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西景德鎮落馬橋窯址宋元遺存發掘簡報〉，《文物》，2017 年 5 期，頁 4-36。
- 景德鎮御窯博物館編，《景德鎮出土明洪武官窯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
- 葉謙、趙綱、邵紅主編，《王者之器——明代藩王用瓷特展》，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23 待刊。
- 銅川市考古研究所，〈陝西銅川明內官監太監成敬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7 年 5 期，頁 26-36。
- 廖寶秀，《明代宣德官窯菁華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8。
- 蔡和璧，《成化瓷器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3。
- 蔡路武，〈湖北明代「空白期」瓷器研究〉，《文物天地》，2016 年 11 期，頁 55-69。
- 劉毅，《明代藩王陵墓考古學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21。
- 謝明良，〈龍與龍珠〉，收入《陶瓷手記 5：中國陶瓷的器形、紋飾與圖像》，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3，頁 83-130、378-382。
- 矢部良明，〈宋元の龍文様と元磁〉，《Museum》，242 號（1971），頁 4-26。
- 矢部良明，〈景德鎮民窯の展開〉，收入相賀徹夫編，《世界陶磁全集・14・明》，東京：小學館，1976，頁 226-261。
- 龜井明德，《元代青花白瓷研究》，川崎市：亞洲古陶瓷學會，2009。
- Ching, Dora C. Y.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ing Imperial Image." In *Culture, Courtiers, and Competition: The Ming Court (1368-1644)*, edited by David M. Robinson, 321-364.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 Clunas, Craig. *Screen of Kings: Royal Art and Power in Ming China*.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3.
- Clunas, Craig and Jessica Harrison-Hall. *Ming: 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4.
- Ebrey, Patricia. "Huizong and the Imperial Dragon: Exploring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Imperial Sovereignty."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41.1 (2011): 39-71.
- Misugi, T. *Chinese Porcelain Collections in the Near East Topkapi and Ardebil*.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1.

Wang, Cheng-hua. "Material Culture and Emperorship: The Shaping of Imperial Roles at the Court of Xuanzong (r. 1426-35)."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1998.

網路資料

三十三画生，〈明楚昭王墓出土石函〉，Wikimedia Commons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朱楨_\(明朝\)](https://zh.wikipedia.org/wiki/朱楨_(明朝)) [#/media/File:明楚昭王墓出土石函.jpg](#)，檢索日期：2023年9月8日。

三十三画生，〈大明楚王墳誌〉，Wikimedia Commons <https://zh.wikipedia.org/zh-hk/File:大明楚王墳志.jpg>，檢索日期：2023年9月8日。

佚名，〈安徽鳳陽明中都遺址〉，《瓷網·中國》<http://www.zhongguociwang.com/show.aspx?id=16597&cid=139>，檢索日期：2023年4月12日。

張強、李瑞生，〈考古專家發掘廓清安徽明中都遺址前朝主殿及附屬建築佈局〉，《中國新聞網》2022年3月31日 <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2022/03-31/9716619.shtml>，檢索日期：2023年9月8日。

張紫贊、劉美子、曹嘉玥，〈鳳陽明中都：考古發現與保護利用「三部曲」〉，新華每日電訊 2022年7月22日 http://www.news.cn/mrdx/2022-07/22/c_1310644823.htm，檢索日期：2023年9月8日。

圖版出處

- 圖 1 青花龍紋盤，湖北省武漢江夏二妃山明景陵王朱孟炤夫婦墓出土，武漢博物館藏。圖版由蔡路武老師提供。
- 圖 2 青花龍紋盤，湖北省武漢江夏二妃山明景陵王朱孟炤夫婦墓出土，武漢博物館藏。圖版由蔡路武老師提供。
- 圖 3a A 型降龍紋。圖 1 青花龍紋盤局部。
- 圖 3b B 型降龍紋。圖 11 青花龍紋盤局部。
- 圖 4a A 型升龍紋。圖 2 青花龍紋盤局部。
- 圖 4b B 型升龍紋。圖 18 青花九龍紋大盤局部。
- 圖 5 新樣龍紋。圖 13 青花龍紋盤局部。
- 圖 6 青花龍紋盤，山東兗州鉅野王墓群出土，濟寧市兗州區博物館藏。圖版取自山東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魯荒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下冊，圖版 307。
- 圖 7 青花龍紋盤，湖北省武昌流芳嶺楚昭王家族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館藏。筆者攝。
- 圖 8 青花龍紋高足杯，湖北省江夏流芳嶺楚藩明妃子墓，武漢博物館藏。筆者攝。
- 圖 9 「天順年置」青花龍紋碗，湖北省武漢江夏流芳明王室墓群鎮國將軍朱季堦夫婦合葬墓出土，武漢博物館藏。（左）筆者攝；（右）圖版取自蔡路武，〈湖北明代「空白期」瓷器研究〉，《文物天地》，2016 年 11 期，頁 64-65，圖 14。
- 圖 10 青花龍紋高足杯，湖北省武漢江夏流芳明王室墓群輔國將軍朱均鉢夫婦墓出土，武漢博物館藏。（左）蔡路武，〈湖北明代「空白期」瓷器研究〉，《文物天地》，2016 年 11 期，頁 66，圖 18；（右）筆者攝。
- 圖 11 青花龍紋盤，四川成都東華門明蜀王府宮城遺址出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圖版取自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景德鎮陶瓷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著，《成都東華門明代蜀王府遺址出土瓷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22，頁 100。
- 圖 12 青花龍紋高足杯，江西景德鎮戴家弄澡堂工地發現，唐英學社藏。圖片由黃清華老師提供。
- 圖 13 青花龍紋盤，四川成都東華門明蜀王府宮城遺址出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圖版取自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景德鎮陶瓷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著，《成都東華門明代蜀王府遺址出土瓷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22，頁 98。
- 圖 14 無款青花雲龍紋執壺，江西省景德鎮珠山御窯遺址出土。景德鎮御窯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編著，《景德鎮出土明代御窯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圖 40。
- 圖 15 宣德款青花雲龍紋碗（故瓷 000032），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6 宣德款青花菱邊雲龍紋葵式高足碗（故瓷 015397），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7 青花海水地礬紅龍紋墩子碗，江西省景德鎮御窯遺址珠山北麓出土，景德鎮御窯博物院藏。圖版取自王冠宇、江建新主編，《填充補白 II：考古新發現明正統、景泰、天順御窯瓷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19，圖 144，頁 374-375。
- 圖 18 青花九龍紋大盤，江西省景德鎮御窯遺址珠山北麓出土，景德鎮御窯博物院藏。圖版取自王冠宇、江建新主編，《填充補白 II：考古新發現明正統、景泰、天順御窯瓷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19，圖 13，頁 104。
- 圖 19 宣德款青花穿蓮龍紋大碗（故瓷 016439N），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0 青花罐殘片，江西省景德鎮落馬橋紅光瓷廠窯址出土，景德鎮御窯博物院藏。圖版取自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西景德鎮落馬橋紅光瓷廠窯址明清遺存發掘簡報〉，《文物》，2020 年 11 期，圖 27。
- 圖 21 青花麒麟紋盤，四川省綿陽成化元年墓出土，綿陽博物館藏。筆者攝。
- 圖 22 白釉堆塑龍紋勾頭，景德鎮中華北路出土，景德鎮御窯博物院藏。圖版取自景德鎮御窯博物館編，《景德鎮出土明洪武官窯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圖 95。
- 圖 23 龍紋琉璃圓形勾頭，安徽省鳳陽明中都遺址出土。圖版取自佚名，〈安徽鳳陽明中都遺址〉，《瓷網·中國》<http://www.zhongguociwang.com/show.aspx?id=16597&cid=139>，檢索日期：2023 年 4 月 12 日。
- 圖 24 龍紋琉璃圓形勾頭，安徽省鳳陽明中都遺址出土。圖版取自王寅寅、邵天禹、王曄、曹穩、宋永偉，〈鳳陽喬潤子遺存磚瓦瓷器及建築圖樣的造物藝術範式考釋〉，《長春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 年 21 卷第 3 期，圖 1。
- 圖 25 佚名，《明太祖坐像》，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6 佚名，《明成祖坐像》，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7 妝金四團龍紋緞袍（13.334），山東鄒城魯荒王朱檀墓出土，山東博物館藏。圖版取自山東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魯荒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冊上，頁 31；冊下，圖版 27。
- 圖 28 妝金四團龍紋緞袍（13.333），山東鄒城魯荒王朱檀墓出土，山東博物館藏。圖版取自山東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魯荒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冊上，頁 29-30；冊下，圖版 26。
- 圖 29 《明宮冠服儀仗圖》，明初內府稿本。圖版取自陳曉蘇主編，《明宮冠服儀仗圖》，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據北京市文物局圖書資料中心藏明代稿本，冊 2，頁 106；冊 3，頁 233。
- 圖 30 瀝粉貼金雲龍紋木盒，山東鄒城魯荒王朱檀墓出土，山東博物館藏。圖版取自山東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魯荒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冊上，頁 168；冊下，圖版 270。

- 圖 31 戩金雲龍紋朱漆大木箱線圖，山東鄒城魯荒王朱檀墓出土，山東博物館藏。圖版取自山東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魯荒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冊上，頁 97。
- 圖 32 描金雲龍紋朱漆大木箱，湖北鍾祥郢靖王朱棟墓出土。圖版取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荊門市博物館、鍾祥市博物館編著，《郢靖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頁 108，彩版 81。
- 圖 33 雲龍紋石函，湖北武昌楚昭王朱楨墓出土，武漢博物館藏。圖版取自三十三画生，〈明楚昭王墓出土石函〉，Wikimedia Commons。https://zh.wikipedia.org/wiki/朱楨_(明朝)#/.edia/File:明楚昭王墓出土石函.jpg，檢索日期：2023 年 9 月 8 日。
- 圖 34 雕五爪龍紋木冊盒，湖北武昌楚昭王朱楨墓出土。圖版取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漢市江夏區博物館，〈武昌龍泉山明代楚昭王墓發掘簡報〉，《文物》，2003 年 2 期，封 2：1。
- 圖 35 佚名，《明宣宗坐像》，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6 白釉暗花五龍紋高足碗（故瓷 003895）（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7 佚名，《明英宗坐像》，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8 《明英宗坐像》展示的龍紋系統（經過修改），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9 宣德款青花雲龍紋碗（故瓷 007792N），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40 青花盤龍紋花口盤，江西省景德鎮落馬橋窯址出土，景德鎮御窯博物院藏。圖版取自湖北省博物館編，《浮梁翠色：江西景德鎮元明青花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頁 74。
- 圖 41 石壙誌，湖北武昌楚昭王朱楨墓出土。圖版取自三十三画生，〈大明楚王壙誌〉，Wikimedia Commons。https://zh.wikipedia.org/zh-hk/File:大明楚王圻志.jpg，檢索日期：2023 年 9 月 8 日。
- 圖 42 白釉褐彩雲龍戲珠紋盤，四川成都東華門明蜀王府宮城遺址出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圖片取自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景德鎮陶瓷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著，《成都東華門明代蜀王府遺址出土瓷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22，頁 274。

Power and Symbol: Porcelains with Five-Clawed Dragon Designs for Ming Princes in the Mid-15th Century*

Maggie Chui Ki Wan**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the five-clawed dragon motif symbolized the emperor, and its use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 general populace was prohibited. However, for *fanwang*, or “princes of the border” in the Ming dynasty, who held neither the status of the emperor nor that of officials and ordinary people, what did the five-clawed dragon motif symbolize? This paper deals with a category of blue-and-white porcelain ware dating from the mid-15th century that features both five-clawed dragon motifs and cross-hatched diamond patterns. Porcelain pieces with such a design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the tombs of Ming princes and their relatives, as well as in regional palaces and kiln sites in various parts of China. Whether they were made by the Ming court or by private kilns remains a subject of debate.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nature of this porcelain category and the reasons for its production. By comparing different dragon motifs found on imperial porcelains, in imperial portraits, from archaeological finds of the Middle Capital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at the tombs of Ming princes from the early to mid-Ming perio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porcelain of concern here was commissioned or purchased by the Ming princes from specific private kilns in Jingdezhen, probably with the tacit approval of the emperor. The porcelain pieces feature standard imperial dragon motifs but avoided the ascending dragon that symbolized the reigning emperor and matched the motifs with cross-hatched diamond patterns which were common in folk porcelain, so as to express the unique social status of the Ming princes who were subordinate to the emperor but also held a distinct position above ordinary subjects.

Keywords: princes of the border (*fanwang*), dragon, porcelain, Ming dynasty, interregnum period, Nanxundian, Jingdezhen

* Received: 13 April 2023; Accepted: 18 September 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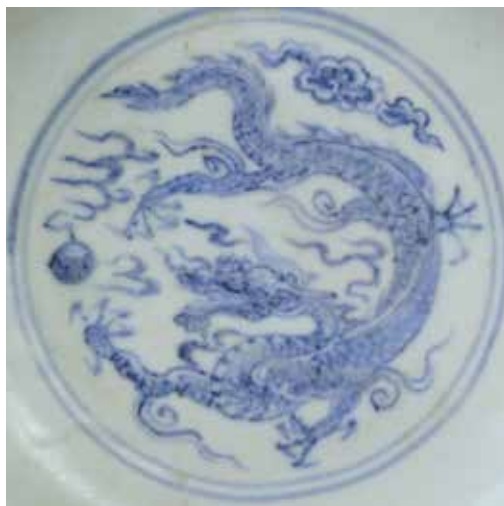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圖 1 青花龍紋盤 明正統 湖北省武漢江夏二妃山明景陵王朱孟炤夫婦墓出土 武漢博物館藏



圖 2 青花龍紋盤 明正統 湖北省武漢江夏二妃山明景陵王朱孟炤夫婦墓出土 武漢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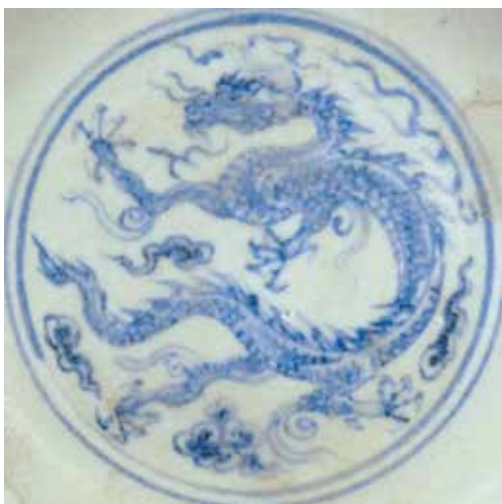


a. A 型降龍紋



b. B 型降龍紋

圖 3a-b A 型和 B 型降龍紋



a. A 型升龍紋



b. B 型升龍紋

圖 4a-b A 型和 B 型升龍紋



圖 5 新樣龍紋



圖 6 青花龍紋盤 十五世紀中期 山東兗州鉅野王墓群出土 濟寧市兗州區博物館藏



圖7 青花龍紋盤 明正統至天順 湖北省武昌流芳嶺楚昭王家族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館藏



圖8 青花龍紋高足杯 十五世紀中期 湖北省江夏流芳嶺楚藩明妃子墓 武漢博物館藏



圖 9 「天順年置」青花龍紋碗 明天順 湖北省武漢江夏流芳明王室墓群鎮國將軍朱季埏夫婦合葬墓出土 武漢博物館藏



圖 10 青花龍紋高足杯 十五世紀中期 湖北省武漢江夏流芳明王室墓群輔國將軍朱均鉢夫婦墓出土 武漢博物館藏



圖 11 青花龍紋盤 明正統至天順 四川成都東華門明蜀王府宮城遺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圖 13 青花龍紋盤 明正統至天順 四川成都東華門明蜀王府宮城遺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圖 12 青花龍紋高足杯 明正統至天順 江西景德鎮戴家弄澡堂工地發現 唐英學社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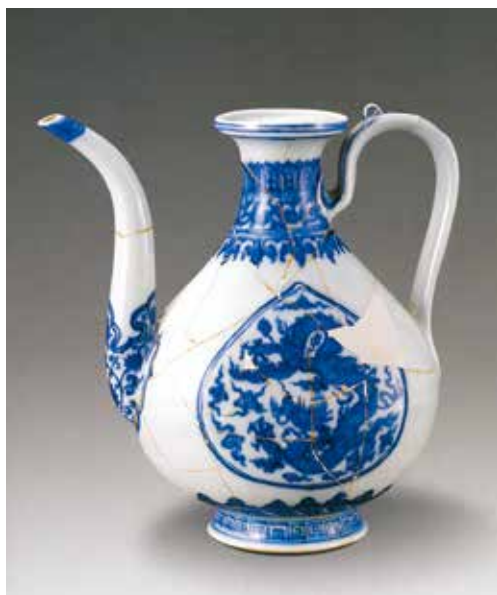


圖 14 無款青花雲龍紋執壺 明永樂 江西省
景德鎮珠山御窯遺址出土 景德鎮御窯
博物院藏



圖 16 宣德款青花菱邊雲龍紋葵式高足碗
明宣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5 宣德款青花雲龍紋碗 明宣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7 青花海水地礬紅龍紋墩子碗 明正統至天順 江西省景德鎮御窯遺址珠山北麓出土
景德鎮御窯博物院藏



圖 18 青花九龍紋大盤 明正統至天順 江西省景德鎮御窯遺址珠山北麓出土
景德鎮御窯博物院藏



圖 19 宣德款青花穿蓮龍紋大碗 明宣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0 青花罐殘片 十五世紀中期 江西省景德鎮落馬橋紅光瓷廠窯址出土 景德鎮御窯博物院藏



圖 21 青花麒麟紋盤 明天順 四川省綿陽成化元年（1465）墓出土 綿陽博物館藏



圖 22 白釉堆塑龍紋勾頭 明洪武 2016 年景德鎮中華北路出土 景德鎮御窯博物院藏



圖 24 龍紋琉璃圓形勾頭 明洪武 安徽省鳳陽明中都遺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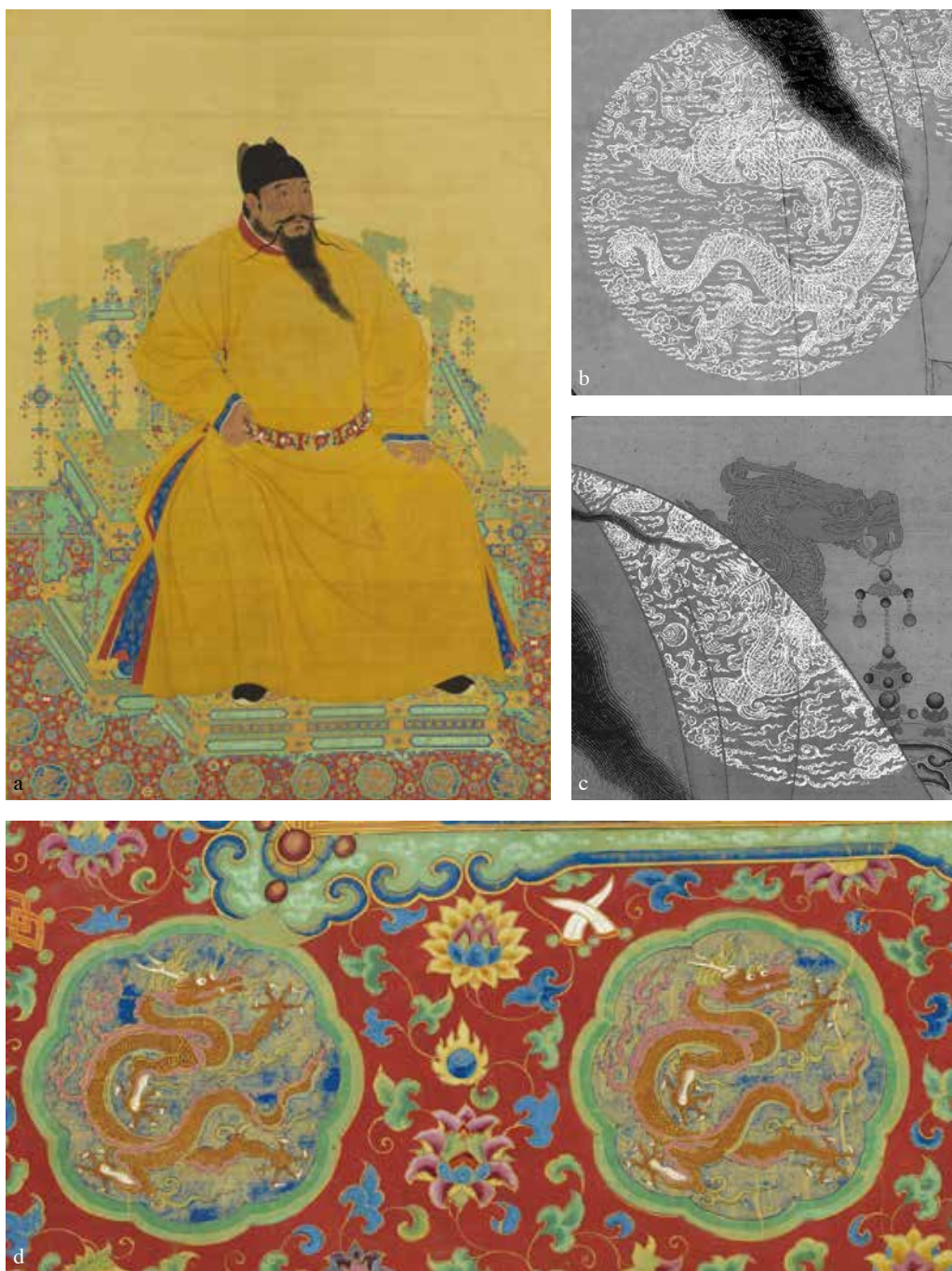
圖 23 龍紋琉璃圓形勾頭 明洪武 安徽省鳳陽明中都遺址出土



a. 全圖

b. 胸前龍紋 c. 肩上龍紋

圖 25a-c 佚名 《明太祖坐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 全圖 b. 胸前龍紋（圖像經過處理） c. 肩上龍紋（圖像經過處理） d. 地毯龍紋

圖 26a-d. 佚名 《明成祖坐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 胸前龍紋



b. 胸前龍紋線圖



c. 肩上龍紋線圖

圖 27a-c 妝金四團龍紋緞袍 (13.334) 明洪武 山東鄒城魯荒王朱檀墓出土 山東博物館藏



a. 胸前龍紋



b. 胸前龍紋線圖

圖 28 a-b 妝金四團龍紋緞袍（13.333） 明洪武 山東鄒城魯荒王朱檀墓出土 山東博物館藏



a. 皇帝常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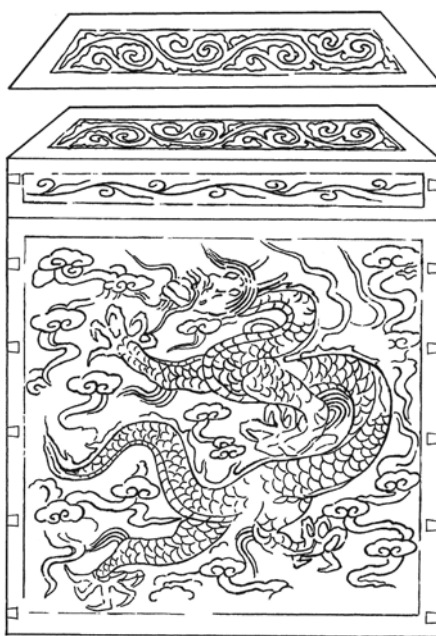
b. 親王常服

圖 29 a-b 《明宮冠服儀仗圖》明初內府稿本



a. 木盒

圖 30 a-b 漚粉貼金雲龍紋木盒 明洪武
山東鄒城魯荒王朱檀墓出土
山東博物館藏



b. 線圖



圖 31 鈐金雲龍紋朱漆大木箱線圖 明洪武
山東鄒城魯荒王朱檀墓出土 山東博物館藏



a. 木箱



b. 線圖

圖 32a-b 描金雲龍紋朱漆大木箱 明永樂 湖北鍾祥鄢靖王朱棟墓出土



圖 33 雲龍紋石函 明永樂 湖北武昌楚昭王朱楨墓出土 武漢博物館藏



圖 34 雕五爪龍紋木冊盒 明永樂 湖北武昌楚昭王朱楨墓出土



圖 36 白釉暗花五龍紋高足碗（局部） 明永樂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 全圖



b. 胸前龍紋（圖像經過處理）



c. 地毯龍紋



d. 座墊龍紋

圖 35a-d 佚名 《明宣宗坐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 全圖



c. 肩部龍紋



b. 胸前龍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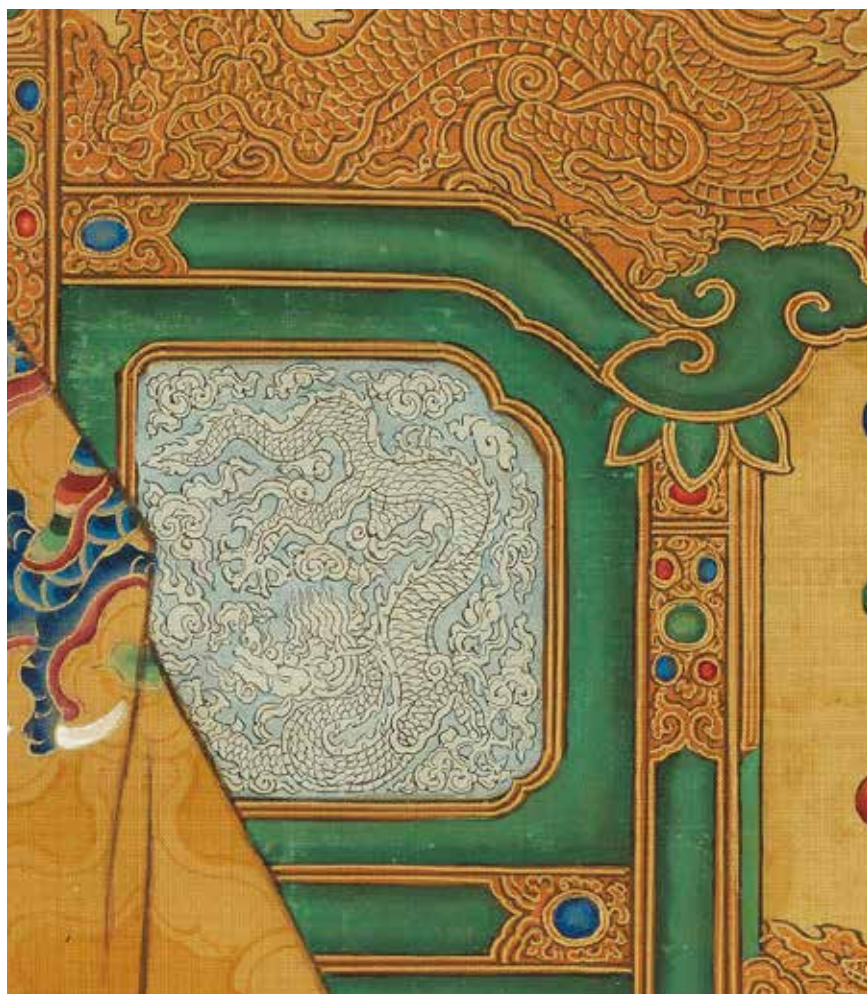


d. 腰帶以下的龍紋

圖 37a-e 佚名 《明英宗坐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 地毯上的升降龍紋



f. 寶座靠背的 A 型降龍紋



圖 38 《明英宗坐像》展示的龍紋系統



圖 39 宣德款青花雲龍紋碗 明宣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0 青花盤龍紋花口盤 元代 江西省景德鎮落馬橋窯址出土 景德鎮御窯博物院藏



圖 41 石塘誌 明永樂 湖北武昌楚昭王朱楨墓出土



圖 42 白釉褐彩雲龍戲珠紋盤 明洪武至永樂 四川成都東華門明蜀王府宮城遺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